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

## 本期目录

###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5：外地串联专辑》

#### 生逢乱世

伏庆是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 楔子

####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一、大串联到成都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三、参加对军区静坐示威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五、逃回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附录：成都军区“红纵”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5月）

##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平静的思茅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上海之行

南下广州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南京印象

到海边去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编读往来

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

【生逢乱世】

##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伏庆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全文详见本刊第101期。作者时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

1966年10月1日，国庆17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月8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

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月15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月20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11632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容（探工系71621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筱丽（水文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 15631 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 71654 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 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 年 10 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 1949 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 K 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

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8·24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

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的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 12 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 12 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 18 年无休止的审查。

---

## 【生逢乱世】

#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丁育民

作者简介：丁育民，上海人，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63 级学生，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成员，首都三司住沪联络站办公室主任。1966-1967 年间，参与了上海“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右图：作者近照。）



楔子

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回忆起来，还犹如昨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被偶然的机遇，推到了当时一些重大事情的风口浪尖上。事件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当时却是震惊全国，震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大事件！尤其是前一个事件，它的结果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以后十年的局势。我亲历介入了那两个大事

件。久有用文字记下来之意，但却因种种顾虑而没动笔。今蔡新平和田春林等老同学发起写回忆录活动，他们动员我把那段历史写下来，我觉得再不写下来以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所以也就欣然动笔了。

我是一个愿过世外桃源式生活的人，却卷入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不知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

书归正传吧，那两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相继发生的上海的“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文革开始以来的两个第一：第一次几千工人卧轨拦火车，第一次几千学生静坐继而绝食示威（也许是解放后的两个第一）。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都让我碰上了。事件中的高层机密我当然不清楚，我只是就我亲历亲为的事实照实叙述罢了。

##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发扬革命大串联精神，让青少年到全国各地熟悉社会，经受锻炼。那时留在各高校和中学里的学生已经很少，基本上都已到全国各地搞“串联”去了，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内也已是学生寥寥。反正早已不上课了，学校的运动在群众中已显得平静多了，留在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无所事事。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我在学校感到无聊，也就乘上火车（反正那时学生坐车也不用花钱）回到了上海家中。

十月二十八日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得知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也在上海。到了十一月三日，我联系到了那位同学，他原来和一些北京地院同学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311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刚成立了几几天，站长是北京地院勘探系的江涛，后来我得知他原名姜金柱。十一月四日，我见到了那位同学，他告诉我联络站刚成立，缺少人手，动员我到联络站去帮忙。十一月五日我和那位同学到了愚园路311号，那是路边的一座带院子的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是江涛等与上海市委作了一番争取后上海市委划给联络站的房子，市委同时拨给联络站一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和几辆自行车，两架打字机及油印机和电话机等，还拨了两三千元活动经费。这个联络站开始是北地东方红发起，以后陆续又有三司其他学校和北航红旗等学生来加入。因属初创，联络站里显得比较混乱。我去的时候大约有二三十人，当天江涛就让我去接待上海各界的来访者，来访者还真多，联络站虽是初创，却已有不少人来访，我第一天

就接待了五批来访者。我这个“散人”第二天就被江涛任命为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站里的这些车和经费等都交由我管理，每天还继续接待各路来访者。因此天天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有时甚至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

我记得我刚接管钱财那天下午，江涛带来两个人对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他们没有经费买纸和笔，站里先借给他们二百元钱吧。”我拿出了二百元钱，并让他们写一张借条，他们中的一个约三十来岁的长得比较清秀文雅的男人给我写了一张借条，并在下面签下了他的名字：王洪文。就是这个王洪文，几天后和我以及张春桥等进行了一场较量！但那天我根本没太注意到这个人。这张借条在我以后去新疆时随其它钱物一起转给了接手办公室主任的彭善慈同学。

这样一直忙碌了近一个星期，到十一月九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在我到上海的前后几天，上海的一群人，主要是一些工人，也有一些工厂的基层干部，酝酿成立了一个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组织，他们的负责人有后来扰乱了上海甚至全国的著名人物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和陈阿大等。开始他们由几十个人很快联系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是要求上海市委正式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上海市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在十一月九日强行分乘了三列火车出发去北京，声称有一万多工人要去北京向中央告状。中央得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认为绝不能开启工人串联的先例，命令立即将这三列火车就地停驶，结果这三列火车分别停在了南京、苏州和上海西面的安亭。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停在安亭的这列火车上，这些人进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让一些工人坐卧在铁轨上，有几个人站在路中间挥舞着大红旗，并让人用红布包住了火车通行的绿色信号灯，致使正要快速通过安亭车站的 14 次特快列车紧急刹车，因 14 次特快在安亭是不停车的，所以车速很快，紧急刹车造成了车窗玻璃碎裂，车内物品乱倒乱飞，乘客一片惊慌，车上还有人受了伤，而且车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外国朋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从九日早晨起，上海西行的铁路一直就不能通行，严重影响了京沪线的交通。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安亭事件”的大事件。

##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点，三司驻沪联络站里的其他人都在上海各个地方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了解安亭的情况，站里就我一人留守。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他是张春桥的秘书，现在张春桥刚从北京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是专为解决安亭问题而来的。这位秘书要求我在联络站里等着，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虹桥机场，以便和张春桥一起去安亭车站，协助解决安亭的问题。

当时站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之前从没见过张春桥或他的秘书，他们大概只要有三司的学生陪同去安亭就行，可见当时是如何的倚重三司。张春桥当时不仅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且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当时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站里回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地院的徐娟娟，一个是新北大的董新中。我就简要地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让他们等着跟我一起去虹桥机场。

大约半小时后，张春桥派来接我们的那位秘书乘上海牌小车到了联络站，我们上车后立即开向虹桥机场。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了虹桥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下车后那位秘书领我们直接进了休息室。张春桥过去我只在新闻片里见过，但见了面还是能认出来的。当时他坐在休息室正中的沙发上，披着军大衣，夹着香烟的手指被烟熏得蜡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尖削的脸显得有点严肃，他周围围坐着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后来经他介绍我才知道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他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跟我们说：“我是张春桥，欢迎同学们！”我也说：“我是三司联络站的丁育民，见到你很高兴！”几句寒暄和相互介绍了其他人后，他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我们立即进入了正题。张春桥拿出了一张约5厘米宽、15厘米长的字条递给我，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不解决安亭的事情就别回北京”，张春桥告诉我，是毛主席亲自让他来的，当天北京飞上海的班机已没有了，毛主席派了一架专机送他来上海。他离开北京时，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了这张字条给张春桥。他并把十日 and 十一日陈伯达打到安亭的电报手稿让我们过目。他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工人同志立即回上海，不能去北京，一切问题在上海解决，以免影响生产和交通，也以免开创工人串联的先例。”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表示愿意立即去安亭协助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立即起身出来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小汽车，张春桥坐在后排的中间，他让我和董新中坐在他的两边，徐娟娟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子就立刻开往安亭，我们的后面跟了一溜十几辆车，那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和随行工作人员。

这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上海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写

的“四人帮传”，其中《张春桥传》里有一章专门写安亭事件，那里面写的东西有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比如说，他写是包炮陪同张春桥坐车去安亭的。包炮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当时是以首都一司成员的身份来上海的，但是也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过活动，因为当时来上海的学生还不大注意一司、三司的区分，反正是北京南下学生就在一起活动。正是他鼓动了上海工人去北京“告状”，他这时正和那些工总司的头头在安亭。我在这里为叶永烈先生作个更正。

话说我们在车上，张春桥和我们说了好多与安亭无关的话。比如，他谈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月份左右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北京目前的情况，十一日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一百七十万革命师生的情况，有关上海市委的问题，等等。他甚至指着 he 脚上穿的一双咖啡色的皮凉鞋对我们说：“今年夏天中央召我到北京，一直忙碌工作到现在，连买双鞋子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天冷了还穿着凉鞋。”真奇怪他当时怎么没有说我们到了安亭怎么行动的问题。

当车行到离安亭不太远的地方时，只见对面疾驶过来一辆轿车，向我们闪着车灯，似乎是在向我们发信号，我们的车队就停了下来，那辆车停到马路对面，从车上下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急匆匆跑到我们车旁，我们的司机打开车窗，那位男子急急地说道：“安亭车站外围聚了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请你们暂时不要到车站去。”

当时张春桥简单问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到工人中间去，不怕！马上去安亭车站！”于是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安亭车站外。这时已是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我透过车窗见到许多工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齐肩长的铁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车站铁栏杆上卸下来的铁条），围站在车站前和马路上，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这时很多工人围了上来，车队停了下来，张春桥让我们都下车，那些工人见张春桥下了车，可能有人认出了张春桥，就大叫着“春桥同志来了”、“春桥同志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就被他们半簇拥半推挤地弄到了附近的安亭无线电电器厂里，拥进了一个有着一条长会议桌的会议室里。

会议室里乱哄哄的。不一会儿，进来了一小群人，自称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当时他们也都很热情很激动地叫着“春桥同志”，张春桥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双方在长条桌前坐下了。他们工总司的人坐在桌子的南面一排，张春桥让我和徐娟娟及董新中在他左右坐在桌子北面，然后市里的那些领导也在我们两边坐了下来，俨然形成了隔着桌子的谈判双方。

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工总司的人员（好些名字是我后来记下的）有：潘国平、陈阿大、王洪文（就是那个借钱的）等，还有北京一司的包炮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接着，张春桥传达了中央对安亭问题的指示精神，指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发生的事情，工人们无论如何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办，迅速回上海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在上海就地解决。中央授权给张春桥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工人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在场的上海市领导和张本人可以和工人代表们当场协商解决，如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马上请示中央，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张春桥说完后，会场上静止了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张春桥也在静静地等着对方回答。

突然，潘国平（当时给我的印象，无论在穿着或气质上潘国平和陈阿大是典型的大老粗，看着他们总让我想起电影中的地痞流氓，可后来他们竟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声音很高地叫了起来，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北京，向中央当面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一万多人，我们绝不回上海！”他也不说为何不行，总之，就是要去北京！这就是无赖的逻辑。接着，对面一些人以及后来陆续挤进来的一大群工人都七嘴八舌地高声附和及支持着潘国平，陈阿大还拍着桌子叫道：“不行，我们要去北京！”有人甚至举起手中的铁棍挥舞着。会议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也急了，站起来高声对大家说：“大家静一静，好好考虑一下中央指示的精神，千万不要冲动！”但我的声音完全被那些喧嚣器淹没了。当时市里的一些领导都面面相觑，后来都站起来说：“大家静一静，听春桥同志说！”慢慢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张春桥。

张春桥站了起来，神情还显得非常镇静，他当时讲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要去北京，这不是小事情，如果你们去了，那么江苏的工人也要去，浙江的，江西的也要去，全国的工人都要去北京，你们想想，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这可要全国大乱呀！工厂没人做工，弄不好农民也要去，那怎么办？所以千万要冷静，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了全国的局势！”这下子，工人们渐渐静了下来，好像有所醒悟，都在互相低声议论起来。

但没几分钟，那个包炮的几句话又点燃了工人们的激烈情绪，包炮看上去很文静，一张白净的脸，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说：“说这些没用，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找中央面呈我们的意见的，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的。”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脸上很平静，但就是这几句话，刚刚有点安静的工人和潘国平，陈阿大们又都大叫大嚷起来，无论上海市委的人如何摆手让大家静一静，都不起作用。那个王洪文当时在我印象里好像显得很镇静，自始至终没叫嚷过，只是不停地和包炮、潘国平他们窃窃私语。

乱了好一阵子，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许那时年轻气盛，也许是初生牛犊不

畏虎，我突然学着陈阿大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道：“你们想违抗中央命令？你们想违抗毛主席？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吗？包炮你是什么居心？”没想到经我这么一声断喝，会议室里登时鸦雀无声，很快静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包炮才慢慢说道：“我们不敢违抗中央的命令，我们只是想让中央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王洪文、潘国平他们低语了一阵后，潘国平站起来粘粘的说：“我们服从中央的指示。”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一下子都没了。

后来想想，这也是以蛮制蛮的方法吧。被那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们包围着，我竟没有丝毫害怕，还拍桌怒斥，真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啊。

这以后才开始进入了比较心平气和的谈判。经过几轮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张春桥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的各项要求等回到上海后逐条协商解决。工总司方面同意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由市委方面组织车辆接回上海，并商定了由我们三司联络站派出一些学生，会同工总司的一些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也派几名有关负责人，一同赶赴南京和苏州，劝说停在那里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

事情有了着落，我即由接我来的车子送我回联络站向站里汇报，并准备组织去苏州和南京的学生代表。到上海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可是我刚到联络站和江涛说了没几句话，又接到张春桥亲自从安亭打来的电话，说工人代表和包炮在去车站内的路上，突然改变了主意，又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仍旧要求去北京！安亭的情况又紧张起来了，张要求我们多去些学生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并说已派车来接我们。这样我和江涛及在站里的好几位同学一起又回到了安亭。

到了安亭的那个会议室，张春桥向我们介绍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到车站现场去做工作。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了火车站内，几个人分头向他们的头头和工人群众陈说利害，反复宣传中央指示精神，这才将那些在场的头头和工人说动同意马上返沪。正在这时，另外一部分工人用大卡车把张春桥从会议室拉到了车站内的列车车厢旁，当时在场的工人们突然激动起来，大家都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来。此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淋着雨，围在张春桥站立的卡车周围。当时记得有一个小插曲，有人在车上给张春桥撑起了一把伞，张春桥却推开说：“工人同志们都在淋雨，我不要撑伞！”这就感动了工人群众。张春桥站在卡车上重申了中央的指示，反复劝说大家返回上海。我们的同志也散在工人当中极力说服动员，最后大多数工人上了几十辆由市政府派来的大客车和大卡车离开了安亭驶回上海。

雨停了，但还有二三百名工人留在车站里不同意回上海，他们在一名叫“左坚”的北京化工学院学生的煽动下，开始向张春桥进行围攻，他们把张围在卡

车上不让休息，并不准我们开来的几辆汽车离开车站，也不准我们的任何人离开车站。当时张春桥让我上了卡车，低声叫我马上回上海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电话向中央汇报安亭的情况。

我和他的秘书马上准备出站回上海，但车不让开出，人也不让出站。我绕了一个圈子，找了个空档一人出了车站，正好一个北京中学生开着我们的摩托车到了站外，我立即让他带我回到了联络站，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了，我立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一位姓钱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告诉我文革小组成员都在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开会，不能来接电话，我将安亭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他说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汇报。

我紧接着又把电话打到了三司总部，是田春林接的电话，我把情况也向他详细说了。打完电话，我这才感到了饥饿，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三点多，我还没吃过东西，所以我马上到附近小店买了包饼干，回站里和着开水吃了。

到了傍晚，江涛他们才从安亭回来，告诉我，我们的人和张春桥等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又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电报，留下的工人才答应全部返回上海，等工人全部离开安亭后，我们的同志和张春桥才回到了上海。

####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虽然在安亭的上海工人全部回沪了，但在苏州和南京还有不少上海工人留在那里，我们从安亭回上海后已派了几个人去那两个地方做工作，已劝说了一部分工人返回了上海，但还有一部分工人不肯回来。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八点，我和江涛等八位同学一起到当时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和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负责工业口的周璧，上海市委的梁国斌，《解放军报》记者刘占玺，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丁学雷（即后来的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开了一个会，讨论解决了当时上海的一些问题，并研究决定，我站再派出九位同志，会同市委的两位同志，明天分头开车去苏州和南京，劝说尚留在那里的少数工人回上海。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才结束。

这次会议上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会议开始前，我们同去的一位北京中学生，叫李民华，发现市长曹荻秋穿了一双长长的黑色尖头皮鞋，这位同学有点气愤地指着曹说：“你怎么还穿这种资产阶级的尖头皮鞋？”曹市长当时显得非常惊慌，甚至有点唯唯诺诺地回答道：“你批评得对，我今天回去马上换掉！”两天后在另一个会议上，我注意到曹市长果然已换了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都穿着这双布鞋。一个堂堂的上海市长，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竟如此态度，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

第二天一早，派去苏州和南京的人就出发了，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终于将留在南京和苏州的上海工人全部接回了上海。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张春桥在上海红都剧场（离联络站很近），接见了刚从南京和苏州回来的及部分从安亭回来的共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市长曹荻秋也参加了接见。我也被通知去了。坐在主席台上往下看，我发现前排座位上坐着一个好像面熟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姚文元，他为什么坐在下面，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姚文元。

下午三点，张春桥到我们联络站来会见了在站内的全体同志，感谢我们在安亭事件的解决上做出的努力，和我们举行了座谈，用写大字报的毛笔和纸给联络站题了词。刚从南京回来的我院朱德瑜为座谈会拍了好多照片，至今我仍保留着一张当时他照的照片。

从那以后，除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一次张春桥外，我再也没见过张春桥。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五号左右，我们征得了上海市委的同意（当时上海市委派了一位处长叫沈宗平的专门做市委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沈经常和我见面联系。还有一位叫周璧的上海工业口的负责人也经常和我见面联系。我好几次帮他们参加一些群众大会等），由周璧签署了一张字条，让《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负责帮我们印发两份当时最新的《首都红卫兵》报，我拿着这张字条和那两份《首都红卫兵》报到解放日报社找到了马达总编，他已经接到了上海市委的通知，所以马上答应付印。我为了尽快出报，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马达说：“你可得开足你的这台马达尽快把报纸给我印出来！”他笑着说：“后天保证把报纸送到你们站里！”

果然，他按时把报纸送到了我们联络站。每份 20000 张，一共 40000 张。当天下午我就发动了在站里的所有同学分头拿着报纸上街去卖，每份卖 3 分钱。没想到上海市民都排队抢着买！到第二天上午除留下的一小部分分送有关单位外，全部都卖完了。收回了大约 1000 元钱，我把这钱交了解放日报社财务科，财务科给的收据我一直保存着，时间长了，认真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出来。

十二月三日，联络站和上海市委派我和朱德瑜同学陪同工总司的十二名代表乘十四次特快列车去北京，这十二名代表中有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北京后，由朱德瑜联系这些工人代表去见中央文革负责人。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天，就乘车回上海了。

让我以一首打油诗结束这段回忆吧：

张春桥深藏不露蛇蝎心

王洪文貌似文静实狰狞  
上海滩二人联手乱中国  
和江姚四人结帮风浪兴

##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左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里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其他的人大多数去参加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即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班的化名）起来揭发上海市委问题的大会了。前两天夜里近 12 点钟徐景贤派人把我和江涛等三四个人接到他们写作班驻地，向我们通报了他们要起来揭市委盖子，我们那天凌晨两点才回联络站。

这时联络站里进来了两个人，和我握手后，其中较年轻的一位对我说：“这位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他想和你们认识一下，我是他的秘书。”

魏文伯我没见过，但是知道他是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我当时很客气地请他们在一楼的一间房间里坐下，并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们站里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刚说了没几句，挂在楼梯旁墙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起身去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先问是首都红卫兵三司联络站的同志吗？我刚说了一句是，那声音就说：“你好！我是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激动地连声叫起来：“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我叫丁育民。”

周恩来接着说道：“丁育民，好。丁育民同志，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请你们帮助办理。”

我连忙说：“总理你请说！”

听到我激动的叫声，魏文伯立即过来站在我身边。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说：“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万名群众静坐示威，新疆自治区有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静坐的人愈来愈多。我想请你们那里派一些学生火速赶赴乌鲁木齐，去协助新疆自治区人委妥善解决这次群众运动。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赶忙说：“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组织同志去新疆！”稍停了一下，我又迟疑地说道：“总理，只是距离太远，现在火车很难上去……”

我话还没说完，身旁的魏文伯抢过话筒大声说：“总理，我是魏文伯，他们去新疆的车票我负责马上解决，请总理放心！”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对魏文伯说了一些话，我只见魏文伯一边说好，一边点着头。

然后，魏文伯把话筒又递给了我，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对我说：“你们到了

乌鲁木齐，自治区有关方面会和你们见面并向你们介绍情况，请你们好好配合他们，务必要妥善解决问题。”

我向总理大声说道：“保证完成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说：“好！祝你们成功！再见！”就挂了电话。

之后魏文伯匆匆地说道：“丁育民同志，我们已经认识了，以后再找时间联系，我先回去为你们办理去新疆的火车票，明天一早给你们送来。请你遵照总理的指示组织好去新疆的人员。”说完他就握手和我道了再见，匆匆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魏文伯，我也不知道周总理为什么从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我们让去新疆，反正我们毫不犹豫地准备明天立即去新疆！

##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魏文伯派昨天来过的那位秘书给我们送来了二十多张去新疆的火车票，一半是卧铺票一半是坐票。我和江涛等几个人挑选了十二名各校的学生，其中北京地院五名（我，钱XX，邱锡华，殷志山，还有一位我忘了），清华大学三名青年教师（蒙国庆，曹维涤，另一名也忘了）和一名学生顾元德。还有三名我记不得他们的学校和名字了。另外还有上海的三位学生以及一名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初中学生，维吾尔小姑娘阿斯娅，她可以当我们的维吾尔翻译。还有新疆兵团医学院的十来名学生，组成了二十多人的队伍，由我带队，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乘52次特快同赴新疆。在车上我们轮流在卧铺上睡觉，因时间太长了。上海联络站办公室的事情我交给了我的同学彭善慈。

列车载着我们过长江，越平原，向西出潼关，走河西走廊，再出嘉峪关，穿山洞，走戈壁，往西一直开了七十多个小时，于二十三日北京时间凌晨零点三十分抵达乌鲁木齐车站。

##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一下火车，就感到这儿的气氛有点异样。经我们跟车站工作人员了解，才知道在八楼静坐的人中有近两千人已绝食两天多了，两天来有几十万人次游行支持绝食学生。有少数工人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已有几十家工厂开始罢工，公共汽车也罢工了，致使大冬天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水电厂的工人也声称要参与罢工，但现在还没有实施。静坐的学生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和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等和学生见面解答学生的问题，而王恩茂和丁盛迟迟不出来见学生。这两天，出乌市的火车被学生拦住开不出去，电报和电话都已封锁不让打，所



以学生想以阻止火车开出的方式让中央知道新疆的事情，听说已有几个绝食学生晕倒了

我们在来接我们的汽车开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扔下行李就立即驱车前往八楼。

八楼，在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直到歌手刀郎特红的 90 年代，也在他的歌里唱到“八楼前的二路公共汽车”。八楼在当时是乌鲁木齐最有名的宾馆，是地标性的建筑。当时绝食的学生都在八楼，我们到那里时，看到楼前和楼里面到处都是静坐的人，好多民族的人，绝食的学生都在二三楼。我们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分散到静坐和绝食的人们中间，跟他们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慰问大家的，周总理要求大家爱护身体，结束静坐和绝食，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尽快和自治区领导联系解决等等。

当时静坐的人也很激动，认为终于让中央知道了他们的斗争。好多人发出了欢呼声。

我们在那里连续工作了近三个小时，这时自治区有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领到一家工厂传达室后面的一间大房子里。进去一看，里面坐了好多人，有穿便装的，有穿军装的，经介绍才知是以自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武光为首的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有武光（他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刚调新疆不久，有一张和善的脸），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有军区副政委柴达诺夫，有自治区副书记祁果和任戈白等。互道辛苦后他们立即给我们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到静坐者中间去多做工作，中央也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刚才在八楼的活动情况，向他们说明了周总理的关心，是周总理派我们来新疆的。他们说他们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协调，尽快解决问题，让中央放心，让周总理放心。接着又商讨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最后他们让我们回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休息一下，他们将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情况。

我们回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七点多，但新疆时间只有五点多。我们和衣睡到天亮，已是北京时间九点多了，吃了点东西后立即分头去了自治区党委，新疆地质局和八楼。去地质局的同志向地质局的孙副局长借回了一些棉衣棉裤、皮衣皮帽之类的御寒衣物，因为乌鲁木齐太冷了，夜里温度近零下四十度，我们这些从上海赶来的人穿着太单薄了，实在抵御不了这里的严寒。刚到那里时我们这几个人走在马路上就不时有人滑倒，因为路面不是冰就是雪。这些衣物我们回学校后都交还给了学校后勤部门。去自治区党委的是和有关人员协商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打电话到国务院办公厅报告具体工作情况，去八楼的是继续对静坐和绝食的学生做工作。

一直到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新疆时间），中央来电表示支持静坐群众的革命行动，并命令自治区党委接受学生提出的五个条件，令王恩茂立即出来接见群众代表，静坐和绝食的行动请立即结束。

向群众宣读完中央的电报后，现场一片欢呼，学生们决定下午三点半停止绝食，但还有一小部分学生一直到六点王恩茂来了后才开始进食。静坐的群众也停止了静坐。

我们接着又忙着给复食的学生安排休息的地方，在人民饭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房间，又让兵团医专的有关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我们忙到很晚才回到休息的地方。

以后的两天是处理善后事宜，经各方协商，新疆的各派群众组织选派了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经中央电话批准，代表团乘一架专机去北京见中央领导反映新疆的情况。我们到新疆的任务到此也就圆满完成。

我前几年看过武光同志有关八楼事件的回忆录，但里面一句也没提到周总理派我们去新疆协助解决八楼事件的事情，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什么考虑呢还是有意无意间把这事忘了，我觉得这本应是武光可以好好描写的一个过程。

之后，我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本意只是在乌鲁木齐最大的剧院人民剧院召开，但要参加的人太多了，只好将乌市所有的剧场的有线广播连在一起，但所有剧场又都涌满了人，还有不少人要参加而进不去，当时乌鲁木齐市的负责人建议将全市的有线广播全开通，原来乌市全市都联有有线广播，这才解决了问题。这次会议新疆的很多领导如丁盛等都参加了。

顺便说几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初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联络站”（事先取得了总部的同意，是我打电话到三司总部，由聂树人接的电话），我被选为站长，清华的顾元德为副站长。我立即与国务院办公厅通了电话（因为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新疆的，在新疆的情况应向总理汇报），报告了我们在新疆的情况，并说明了建联络站的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给自治区人委来了电话，让转告我们，他同意建联络站，但人要少些。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了，联络站只有十来个人。

就我们这次来新疆一事，就可以明显感到周总理处理事情的细致和有始有终。

到了元月十八日上海联络站来电让我回上海，我就乘火车回上海了。新疆联络站的站长就由顾元德接替。我从此再也没去过新疆。

也以一首打油诗作为结束吧：

大西北新疆八楼风云起

千万里总理指示急行西  
报国家风雪严寒何所惧  
排忧解难小学子心头喜

---

【生逢乱世】

##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陈永迪



作者简介：陈永迪，1943 年 5 月生，四川广安人。  
1967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石油物探专业。  
1967 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先后在地调处、科技  
处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左图：作者近照。）

文革时期我是北京地质学院 66 届的学生，也是北地东方红的一员。从 1966 年 11 月到 1967 年 6 月，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经历了成都的“二月镇反”，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 一、大串联到成都

1966 年 11 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级拥挤的火车，煎熬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四川省地质局将机关大食堂改成接待站，用稻草铺在地上形成一个大通铺，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妈在成都军区机关作军医，军区机关北较场离地质局很近，所以我是两地轮流住，大多数时间住在地质局。

北地东方红在地质局设了一个联络站，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交流信息，组织活动。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联络站的负责人经常变更，我都闹不清楚有哪些人，比较固定的负责人是我们同系同年级的谭宝华，有什么事总是他通知我。联络站不是一级组织，负责人就是接电话、动员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在外边代表北地东方红表态，讲话也从来不向联络站请示、汇报。我来成都以前，发生了导致成都红卫兵分裂的 11·13 事件，据说我们联络站的人参与了冲击红成主持的大会

进行造反。但我来成都后的印象中，我们对红成内部两派没有明显的倾向，只是略偏向 8·26，真正对红成不满是在“二月镇反”后。我们与红成勤务组主要负责人、成都地质学院学生武陵江关系很好，有重大活动都事前协调。

我到成都想实现一个雄心壮志：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我约了 4 个同学，两位大学同学，两位中学时的同学，“朝圣”路线是重庆——遵义——韶山——井冈山。12 月 7 日从成都出发。

串联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两件。

12 月 8 日从龙泉驿到简阳石桥铺，要翻越龙泉山，这座山不高，但中间有一段异常陡峭，对我们这些走惯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验。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前面响起了悦耳的童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听见童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学停下来称赞他：“小朋友，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在学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向你学习！”他说：“是公社干部要我们来这里守到，看到红卫兵过来就大声读毛主席语录，守半天记一天工分。”

12 月 10 日到达铜梁，铜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乡，在一处可以俯视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晚上我们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题词室参观时，突然来了几位戴红袖套的中学生，进门就乱砸，把放有金日成题词的展柜砸得稀里哗啦，纪念馆的两位女服务员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们赶紧上前拦住，这几个中学生看袖套认出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停止了打砸。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词：“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头子，忘恩负义的家伙！”

走了 5 天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条件太差，14 日又搬进城里。表哥在重庆医学会工作，他们单位在邹容支路有一个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处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从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4 位同学陆续离开重庆各奔东西。

送走 4 位同学后，我在临江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内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遇到王大宾。我和王大宾都是四川老乡，大一的时候还一起上过大课，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告诉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务：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我和王大宾以及驻渝联络站的一群同学紧急赶回成都。在成都听取已经和彭德怀有接触的同学汇报情况，他们和彭德怀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认为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拥护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他。王大宾也同意这个意见，还派了郑文卿和王大来飞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几天后东方红总部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宣布：王大宾犯了右倾错误，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12 月 23 日，我们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抢回地质局，12 月 25 日成都铁路局安排专列将彭德怀、成都军区派的押送部队一个排和我们学校的同学送回北京。（有关详情见拙文“我参与的揪彭德

怀行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遗憾，由于专列上的人太多，我没挤上去，没能与彭德怀同车去北京。

在成都过了元旦，有几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带路去北京，他们要到中央部委告状。1月2日我和好友们又踏上去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们都住在我们学校，那时，学校内部有一条“潜规则”，出去串联的同学不能收铺盖卷，人走了要将宿舍的钥匙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以便接待外地进京的学生和群众。我们每天奔波在学校和部委之间，好在取得了好友们比较满意的结果，他们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镇反”前夕，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为“冲击公安机关”的“反革命事件”，开始抓捕有关人员，气氛已经开始紧张。

##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为了说清成都“二月镇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交代成都军区领导的变动情况，因为他们是“二月镇反”的主角（有关情况都是我在驻成都联络站期间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在大会上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即日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会成了埋葬他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的动员会。军区的“四大”开展不久，矛头就直指黄、郭，不久黄、郭被停职，6个月后就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

据秘书揭发，黄新廷到北京开会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带去的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视察时，黄新廷陪他们钓鱼、看戏、打牌。黄新廷警告那些不听话的高干时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与贺老总、罗总长有不同一般的关系，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贺老总在毛、刘之间站错了队，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贺龙，采取“剥笋策略”，由外向内逐层剥离，黄新廷等将军就是被剥掉的第一层。

黄、郭被军委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后，主持成都军区日常工作的首长换成甘渭汉和韦杰。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韦杰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上阵一身轻。韦杰论资历论能力不在黄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他领导的志愿军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围歼（据说，毛泽东曾对韦杰讲责

任不能完全由他负)，文革前在成都军区一直受排挤。此二人上任时形势险恶，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处于瘫痪状态，李井泉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甘、韦接手时，军区班子已残缺不全，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共 10 人，已有 4 人被打成“黑帮”，他们是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业务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问题还在于此时甘、韦说话不灵权威下降，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门来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韦上台初期很少公开表态，他们对文革不满但没有胆量直接反对，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没有拿到尚方宝剑。

1 月 28 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尚方宝剑不请自来。

1 月 29 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时说：“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

1 月 30 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受此鼓舞，韦杰在 2 月 5 日召集成都公安负责人说：“现在牛鬼蛇神出来了，就是要他们暴露，暴露出来才好打。”

2 月 8 日，韦杰敦促省公安厅成立“镇反”领导小组。

2 月 10 日，韦杰正式向公安部门下达镇反命令：“打击重点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的反坏分子。”

2 月 11 日凌晨 2 点，军区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被逮捕 30 多人；上午 9 时，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 028 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造反派 16 人。

2 月 1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

当天下午，我正在地质局北地东方红联络站睡觉，文革以来我们都成了“夜猫子”，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已成常态。联络站负责人谭宝华来把我们叫醒，他简单介绍了形势和任务，听说要去北较场东营门静坐，我还傻呵呵的高兴。为了壮声威，把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我们一行人喊着口号向北较场进军，到了东营门，将宣传车堵在门口。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锁即成瓮中捉鳖之势，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

静坐初期气氛宽松，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我还常回家看看。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危机感紧迫感，1967年“一月风暴”以来到处“夺权”，我们都“战无不胜”，头脑里充满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军委八条”下达了，对八条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没把军区抓人当回事，那时候抓人、放人很常见。

我还到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去看过，那里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嬢儿”，看样子他（她）们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这场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2月11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街道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街道分团方拒绝撤离，由此双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平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像以往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

####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约十点，突然传来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简称：2·17信件），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

剑英批准下发的。

这时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有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我们散发印有 2•17 信件的传单。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张，就在我埋头读传单时，静坐队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形势异常危急，所幸我方还有不少人，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时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我们怀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机座位将宣传车开动起来了，车子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我们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东西。

我正顺着文殊院街往东走，准备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学同学家里避难，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好险！幸亏冲出来了。我继续往东走，只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一张大网正在向我们罩下来。

2•17 信件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记载，这次“镇反”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 8 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 33000 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组织开枪的流血惨案。

##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学家里，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学一家人还帮我出主意，商讨怎样回北京。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直接从火车北站乘车直达北京，这条路省事方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想得到火车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对乘客严加盘查，火车北站的广场上还有许多“点水”的人（成都人对告密者的贬称），走这条路是找死；另一条路走重庆顺长江经武汉回北京，这条路绕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庆有表哥，他们的接待站也还在运行，武汉也不陌生，一年前我们在湖北省地质局搞“四清”，住过地质局黄浦路招待所。为了避开火车北站，计划先出城到龙泉驿，再步行到简阳石桥铺上车，只要避开公路上的盘查点就可行。朋友也认为此路线为上策。

2 月 18 日上午，朋友将我送到九眼桥，看着我坐上九眼桥到龙泉驿的班



车。车到一个叫大面铺的地方时出现了险情，大面铺的路口设了检查站，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民兵旁边站了几个“点水”的，他们的魔爪指向谁，谁就必须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绑。说实话，轮到检查我时心里很紧张，检查的民兵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龙泉看亲戚。”民兵手一挥，放行！估计刚才被“点水”的几位是川师和本地的兵团、八二六的人，他们不认识我。

经过一番折腾，下午到了龙泉驿镇，找到两个月前步行串联时的接待站，进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龙泉驿镇，我沿着步行串联时的小路往简阳石桥铺方向走，昏头昏脑走迷了路，走到一个叫五风溪的小站上了到重庆的慢车。2月20日早晨终于到了重庆，表哥的接待站还在运行，表哥替我买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汉的船票，还给我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热闹，每天晚上都有摆擂台辩论的，因为我对重庆的情况不熟，不知道他们在辩些啥，感觉重庆的气氛比成都好，五十四军还没有对本地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一些消息：

△重庆革联会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属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人抓起来，并布置砸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成都保守组织“三军一旗”抄了兵团总部。

△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跪成一片，以示请罪。

△2月23日，八二六负责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逮捕，全城贴出《特大号外》。

.....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门码头上上了东方红33号，那是一艘大型客轮。当晚12点驶到万县码头，船上广播：“东方红33号船要在万县码头停2小时……”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点吃的，我沿着长长的陡坡石梯气喘吁吁地爬上码头，一条阴暗狭窄的小街呈现在眼前，街两边店铺的大门紧闭，行人稀少，枯树在风中像鬼影摇晃，寒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注意到墙上的大字报被撕扯过，好奇心驱使我走近观看，大字报字迹依稀可辨，上面写着：2月22日在万县××（字迹不清，后来在资料上查到是个教堂，叫“真元堂”）军队开枪打死了××名群众，“主力军”组织了抬尸游行，已有许多人被抓捕……怪不得，万县码头如此阴森恐怖。

经过2小时停靠，早晨6点船进夔门，两岸悬崖壁立气势磅礴，江涛怒吼仿佛愤怒的控诉。出了南津关，船平稳地行驶在江汉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点到了沙市。

在沙市码头要停靠半小时，我远远看见码头上有一群人，正打着旗帜不停的

喊叫：“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刚靠上码头，那帮家伙蜂拥而至，像“鬼子进村”一样冲进船舱，对着房门咚咚乱敲，不开门或开慢点就用脚踹，通道里只要挡路的一掌推开，嘴里喊着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对此极为气愤，有的乘客和他们大声争吵，有的还打起来。我站在船的前舷看着这场闹剧，只觉得这帮混蛋太过分了。不远处一个人背对着我，看得出他是指挥者，喽啰们不时跑来向他请示。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们北京地院的同学，同为“北地东方红”的战友，我一激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级我是五年级，在学校里常碰面彼此认识。我问他，你们到底要干啥？他说抓沙市军分区通缉的反革命！我说我们在成都是军队要抓的“反革命”，你在这里帮军队抓“反革命”，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整自己人吗？劝他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他听了后觉得有理，于是一声令下，撤！那帮横冲直闯的家伙还真听他的，立马撤离。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应了，在撤离的混乱中乘机扣了他们几个人。船又启航了，那帮人到岸上才发现少了几个同伙，立马又挥动旗帜高喊：“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长不予理会，东方红33号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扬长而去。

2月28日下午3点到达汉口，下船后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车站购票的路上，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车在大街上巡逻，墙上贴满“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今天凌晨，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汉军区高级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书写大标语“长江日报的××社论好得很！”……武汉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城市，来了就想尽快离开。

3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

##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笼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我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401室，我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朋友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所谓资料组就是收集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我参加了甘渭汉小组，负责的同学给了我一大堆甘渭汉的讲话，总政的揭发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动言论”。

归纳起来甘渭汉的材料有这样几类：红军时期的表现，甘渭汉是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证明他是彭、黄死党；在总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间的表现，证明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成都军区主政的表现，证明他以造反派为敌，反对文化

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时间就开小组会讨论，组长叫大家谈看法。有一天，讨论甘渭汉的“反动言论”时，有一位同学说，看到甘渭汉文革前在全军干部会上的报告，甘说“我军高级干部年龄偏大，军长、军政委的平均年龄 51 岁”。这位同学据此发挥：“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甘渭汉居然嫌他们老了！这不是反动言论什么才是反动言论！”我提出不同意见：“甘渭汉是总政主管干部的负责人，向与会代表报告干部的状况是他的职责，他说的是客观情况，没有说超过 50 岁的军级干部一律免职。这一条加在‘甘渭汉的反动言论集’里有点牵强。”可是，大多数同学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垃圾，当年我们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资料上，没有参与西南联络组的其它活动。记得谭宝华告诉我周总理见过他：

3 月中旬的一天，东方红总部通知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 1 点钟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总理从里屋走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四川镇反的情况，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谭宝华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总理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我们鼓舞很大，虽然周总理没有对四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 月 14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收到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的来信，记者摘编后冠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标题，刊登在 3 月 26 日《文化革命简报》435 期上，分别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阅。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此后，解决四川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4 月 3 日，成都军区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

△4 月 4 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 号），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 号文件的发出标志解决四川问题的基调已经形成，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倾斜。

△4 月 8 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

4 月 12 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

4 月 18 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我们曾在四川串联过的同学又开始跃跃欲试了，邀约再次“杀”回四川去。因为中央在3月8日、3月18日两次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次回成都都不敢大张旗鼓。4月22日，我和清华的一位同学（中学的老同学）坐火车回到成都。刚回成都时仍住在地质局，已经有几位同学先到了，负责人还是谭宝华。地质局没有接待经费，也没有专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待我们，能住在那里全凭已经翻过来的造反派的老关系。大约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经常到地质局，有事就去找谭宝华，平常独自活动。

此时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份已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刚到成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这位朋友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姓刘，一起在军区大院长大的“铁哥们”，他是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造反派的头，“二月镇反”时被产业军抓进了市大监。“2·17”信件公布后，产业军天天抓人往市大监送，市大监对产业军送来的人来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亲是军区的二级部长，我叫他刘叔叔，镇反时被派到成都市邮电局当军管会主任，刘叔叔白天在单位理直气壮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头丧气挨骂，王阿姨（朋友的母亲）哭着向他要人，说：“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儿子被抓到哪儿都不知道，你把我找回来！”王阿姨曾经到所里打听，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经抓到监狱里去了，具体在哪里我们不晓得！”朋友的父亲也很为难，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场站错的风险。有一天，刘叔叔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的老战友、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了电话，说：“我儿子被你抓起来了，抓到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给我打听一下。”对方大吃一惊，说：“怎么你儿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赶快给你查！”几天后回话：“查到了，关在市大监，我下令马上放人！”就这样朋友有幸提前出狱，出狱后在家休养。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一些黑幕，进去先“退神光”，几耳光打在脸上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敢喊冤叫屈为止。初次进监狱的还要排成纵队通过产业军的人墙，产业军以打人为乐，比赛谁打得凶、谁打得狠，打晕打残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粮食供应不上，饿饭是常事，监狱里关的人实在太多，多到睡觉都不能翻身。朋友从小在优裕的环境长大，从没吃过这份苦，说起来失声痛哭。刘叔叔在旁边静静地听儿子诉苦，一声不吭，王阿姨则情绪激动，痛骂产业军不是个东西。

“红十条”下达后，市邮电局军管会办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顾，他们来帮助军管会转变立场。刘叔叔表示坚决执行“红十条”，向他们赔礼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饶，有一天，刘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杀手锏：“你们不要这么凶嘛！你们是造反派，我儿子也是造反派，你们坐过牢，我儿子也被抓到

市大监！”造反派听了很惊讶！原来军管会刘主任和我们一样都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从此不来闹了。

##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气冲天，产业军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陆续发生了几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厂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厂武斗事件（简称“五六”事件）最为惨烈，双方直接参与的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点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级学生李全华，跟随6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宣传车从正门开进厂区，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据守大楼的产业军枪手向宣传车开枪，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

当天，我去见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镇反”中被关进市大监的朋友，请他加入我们联络站。在路上听说132厂发生了武斗，立即搭车前往，一路上见到不少救护车拉着警报飞跑，有人从窗口将血衣伸出，我们的车在人民公园附近被堵得动弹不得，错过了去现场的机会。

当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80多个单位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五六”事件惊动了中央，也促进了四川问题的迅速解决。

5月7日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文件共有十条，因此简称“红十条”。

5月16日，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达成都。当天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驻扎在那里，几天来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

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张、梁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他们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双方的赞扬。

张、梁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当时，成都军区不少干部战士对“二月镇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会上受压的产业军也跑到军区大院来出气，产业军在大院内横行霸道，抄家、打人、砸

车、撕大字报。他们抄了副司令员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赖着不走，因为他宣布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嚣：“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汉、韦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不过，梁兴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刚到成都不久，在军区第一招待所3号楼会议室与成都各派群众组织见面，当时我也在场。开会前大家围着他闲聊，有人问他：“梁司令，听说在朝鲜彭德怀把你骂惨了！”我们都以为梁兴初会对彭德怀痛加斥责，以显示他正确并与彭划清了界限，可是梁兴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打完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向我道歉，他表扬三十八军是‘万岁军’！”梁兴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彭在总结会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围歼联合国军立下重大功劳。志愿军总部通电表扬，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传遍天下。文革期间，彭德怀已“臭名昭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说他的好话？梁兴初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他们表面喊团结，实际搞分裂，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

##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回到成都后，谭宝华派我联系军内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华井冈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学商量成立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离军区东营门不远的省民委机关大院内，因此称为“民委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支持军内造反派，向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宣传“红十条”。我们印了一些传单在军区大院内散发，办了一张小报《红雷达》。后来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学生，5月中旬来了几位中国科学院红旗派的人，他们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联络站的骨干。

在民委联络站期间，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下图：1967年成都民委联络站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为中科院老王，右3为本文作者。）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带来两位女士，老王介绍其中一位气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鲁溪，另一位陪同者姓乔，乔女士也学历不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博士，她们想了解成都军区的文革情况，我请来曾是军区司令部造反组织“红纵”勤务组的负责人徐耀明向她们作介绍，我当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记录见附录）。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电成都军区，请转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学，“四川省革筹已成立，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川同学，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附录：

以下是1967年成都军区“红纵”勤务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根据我当时笔记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

月 28 日) 下达后, 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 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2 月 10 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 而是被逼供的记录), 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家里, 在黄家里开过黑会, 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 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 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 2 月 11 日上午开始, 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 028 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许多人, 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队(成员主要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 等造反派组织。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 2 月 11 日晚, 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 “老保抓人了!” 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 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 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步。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 围了 4 天, 直到 2 月 15 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 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 兵团、826 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 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 要求放人, 由此而引来了 2·17 信件。

3 月 21 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 在场的有军区司令部朱副参谋长、温副参谋长。王拒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 当场将王打翻在地, 逼他承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军区开展“四大”后, 有大字报说黄新廷是军区一霸, 称之为“黄霸天”)。从此, 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在军区机关广为流传, 直到“红十条”下达后也没有消毒。张、梁到四川后, 红纵曾给梁司令汇报过这个情况, 梁始终不表态。

军区的形势总的是好的, 表现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场已转变或正在转变, 认识有了提高。军区原来的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 表面上还是说红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还说徐耀明同志态度好, 我们要给他平反, 向他学习……有的领导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 愿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 并且随叫随到! 中央的“红十条”下达及时、打中要害, 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但是, 张、梁到成都军区后, 我们的困难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善, 甚至有恶化的趋向。究其原因, 中央决定下达后反动的东西必然要垂死挣扎; 其次老保要给张、梁首长制造麻烦, 打乱他们的部署, 还有走资派也会在暗中耍阴谋放暗箭。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 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 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 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要先听汇报, 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 当晚一见面梁就说: “红纵还在活动吗? 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 你们要注意团结, 不要搞分裂!” 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 梁承认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 还把战旗文工



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当时张、梁住地）围住梁司令，控诉红纵的“罪行”。梁叫人打电话给徐耀明，要他来听听群众的意见。那些人“控诉”：红纵是黄、郭一手扶持起来的保皇组织，还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联，参加支持宜宾造反派的大会等等，应该取缔、解散。梁听后武断地宣布：“你们红纵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说：“军委命令机关一律不搞四大！”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的口号对不对，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这时有人来汇报说，火车南站武斗，有战旗文工团的人受伤，梁说：“谁叫他们去的？”谈话到此结束。

从5月20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当晚就传红纵是非法组织，要取缔，要砸烂红纵的狗头。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826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老保们20日前还比较谨慎，20日后（即梁接见后）就敢公开活动，如：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sup>1</sup>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sup>2</sup>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散布：梁司令说红纵是非法的！红纵要血洗北较场，要与司、政、后干战血站到底！中和场、火车南站的武斗就是红纵挑起来的，要集中力量把红纵搞下去。

张、梁来之前，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向红纵靠拢，现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过去我们提着脑袋斗黄、郭，现在居然成了老保，你们说怪不怪，我们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说的“真正的保皇派”实际上是暗指红纵。

总的来说，张、梁来后情况更恶化，原来的希望变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台，还要看下去。现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们也担心造反派打内战，还

---

1 成电红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与当时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等站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被认为是保守派。“二月镇反”时期非常活跃，其首领多为干部子弟。“红十条”下达后迅速瓦解。

2 “三军一旗”，被称为“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造反军或称八一荣复军、成电红旗。

担心张、梁受原班子的影响。张、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几个关键部门：张梁办公室、省革筹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的组成人员的立场。张梁办公室（除了梁从广州军区带了两个秘书和一个作战部长外）工作班子里没有一个造反派，这些人先投靠黄、郭，后投靠甘、韦，如：谢×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提拔的黑干将，张××是政治部副秘书长，紧跟余××（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贴心豆瓣。省革筹办公室由张西挺筹办，她提出要红纵的人，军区党委不同意，估计是甘、韦继续发挥影响的结果。支左办基本是原班人马，我们称它为支保办，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长刘××。这样的班子组成，我们很担心造反派的声音反映不上去。

红成的立场很成问题，他们在街上刷大标语“决不能抹杀红卫兵小将在镇反中的功劳”，红成认为韦杰的镇反要否定，但是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人抓多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甘、韦说，他们（指兵团、826）要打倒你们，我们（红成）不打倒你们。军区的老保到处散布红成和他们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是根据徐耀明当时谈话的记录整理的，由于时间久远，加上笔记本字迹不清，可能有个别错漏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其中反映出的观点当然都是当时形势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确的，但它是那段历史中讲述者的经历和思想的真实反映。

---

【生逢乱世】

##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华府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右图：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华府，河南人，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东方红公社的发起人之一，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宣言起草人，虽然在地院东方红走向全胜之后的1966年10月下旬后就当了逍遥派，但在朱成昭被打成“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大案首犯后，仍被划为该“反革命叛国集团”核心成员，遭受长期牢狱之灾。由中央专案组审查多年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后，1980年底才得到彻底平反。



1966年10月下旬，戴良吉（我校水文系学生，东方红成员）找到我，说他要和大串联，想邀我同去。我当时正好已对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去了热情，特别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已经显露出来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似乎已经沦为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对继续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劲头不大了，于是我想当逍遥派了。三司刚成立时，朱成昭要我做他的代表常驻三司，我都没同意，确实不想再干了。现在正好是个机会，就答应了和戴良吉同去串联。

我去找朱成昭请假，朱成昭很是吃惊，说，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对我们十分有利。你怎么现在突然要离开了？我说我已经厌倦了，失去了热情，想当逍遥派了。我想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朱成昭感到十分惋惜，却又无法挽留。最后，他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强留你。总部的位置给你留着，等你串联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总部来。两人握手告别。

###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我遂与戴良吉乘车南下串联。我们先到郑州下了车，我回家看了看，待了一天。我们又到了武汉，在武汉待了几天，到武汉大学转了转，看了看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接着就南下广州。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吃饭吃冰激凌，发现都是先吃，吃完了再给钱，觉得非常稀罕，我们北方都是先交了钱然后才吃饭。我对戴良吉说，要是饭的来了，吃完了不给钱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是广州富，没有要饭的。哪像你们河南，要饭的那么多。我想，这可能和当地的富裕程度有关，也和当地人的修养、素质和习惯有关。广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随后我们乘车到了桂林，我记得我们住在师范学院。我们在桂林住了好几天，每天都会到桂林的市区游览。有一天，我们来到伏波山游玩，碰到两个小姑娘在山下的河里游泳。戴良吉是我们学校游泳队的，看到水心里就痒痒，他随身带有游泳裤，外衣一脱，一个跳水动作就扎到了水里。那两个小姑娘大约有十三四岁，看到了他潜水就大声地喊他。等他从水里出来，她们就告诉他，这里水很深，下面是地下河，潜得太深了会被急流卷走的。叫我替戴良吉担心了一回。

随后我们和小姑娘攀谈了起来。她们一个叫阳征云，一个叫毛向林，都是刚上初中。现在学校不上课，她们天天出来玩。我觉得毛向林的名字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改的名字，问她是不是，她说不是，是从小她父母给她起的。我赞叹她的父母真有先见之明。当她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时，显得很兴奋，打听

北京的事情，听到北京的什么事都觉得新鲜。她们自告奋勇，说明天带我们去七星岩和芦笛岩玩。我们说，七星岩我们已经去过了，但不知道芦笛岩在哪里，还没去过。她们俩说，第二天就领我们去芦笛岩玩。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芦笛岩。我觉得七星岩一般般，但芦笛岩十分好看，只是离市区很远。如果没有她们俩带路我们很难找到去的路。

我们要离开桂林了，两个小姑娘很想跟我们一起去串联。我和戴良吉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带她们比较好。年龄小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性别不同，住起来很不方便。

###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离开桂林，我们就直奔了贵阳。戴良吉的哥哥在贵阳，而我的梅姐姐（我大姨的大女儿）也在贵阳。在贵阳下了车，肚子已经很饿了。我们决定先吃饭，吃过饭再各去自己的亲戚家。我们来到了一家小饭馆，像大排档一样，是露天的。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面条。我们很饿了，一人要了两碗面条。老板问，要辣的不要？戴良吉喜欢吃辣，大声说，要。我不敢吃辣，想说不要，戴良吉说，这里山高水寒，吃点辣的好。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要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吧，万一太辣了可以两碗兑起来，就不会太辣了。我就要了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面条很快端上来了，一吃，哇，还真辣！幸亏我有先见之明，于是我把辣的那碗面条捞到了不辣的碗里，搅了搅，开始吃起来。哎哟，不辣的这碗面条也被染辣了。哎哟，那个辣呀，我至今还忘不了，直辣得我满脸流汗，像过夏天一样，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每吃一口都要吸溜半天舌头。把那个女老板看得都很心疼，说，哎哟哟，没见过这么不能吃辣的人，过夏天也出不了这么多汗，你看看辣的！早知道不给你辣的了。最后，勉强吃了一半，再也吃不下去了，但辣也辣饱了，也不觉得饿了。贵州的辣椒真辣，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害怕。

我们在贵阳住了好几天。我住在我梅姐姐家，那是一栋单独的楼房。但是没见到我姐夫，我问我姐，姐夫去哪儿了？我姐叹口气说，快一个月没回家了，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十字（贵阳的市中心，是个十字路口，所以叫大十字）挨斗。我听了，默默无语。我姐夫是贵州省管文教的书记。整个教育战线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是管文教的，挨斗自然是首当其冲。

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大十字，去看批斗大会。我看到台上站着五六个挨斗的人，低着头站成一排。我姐夫站在中间，其他几个估计是陪斗的。整个批斗会还比较文明，不像北京，搞体罚，揪着头发按着头，拧着胳膊往上抬，叫做坐飞机。我仔细听那些批斗的人念的发言稿的内容，除了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

路线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涉及生活作风方面的内容。我回去后，对我梅姐姐说，放心吧，我姐夫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作风方面的问题，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都是，过了这一段儿时间就没事了。我梅姐姐听了，稍微安心了一点儿。

没想到，我姐夫第二天还回家了一趟。我给他讲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刘少奇。我姐夫听了，吓得连忙制止，连听都不敢听，慌忙说，可不敢乱说呀，可不敢乱说呀……我还想继续开导他，他吓得不敢听，连忙就退了出去。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很快又跟着陪他来的人走了。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很可怜。从上面下来的文件都是中央文件，他们都是按中央文件办事的。现在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那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他们都是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的，那还不吓死他们。

又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门突然响起“咣咣咣”的打门声，声音又大又急。我问我姐，什么人哪，怎么这样敲门？我姐脸色都变了，说又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每次来抄家，见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见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中午来了还要给他们做饭吃。我说，还有这事？我下去看看。说完我就往楼下走去。

这时已经听到“开门开门”的叫喊声。我快步走去，把门打开，看见是两个十五六岁的红卫兵站在门前。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我姐姐没有男孩儿，只有三个女儿）。他们愣怔了一下，又看见了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顿时就没有了刚才的气焰，在犹豫着进不进去。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抄家。我又问，你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红卫兵组织的？他们两个扭捏着不肯说。我说，你们不知道抄家是要由红卫兵组织出面按规定执行的吗？他们无语。我又说，你们知道抄家对拿走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登记造册，不能见什么拿什么，见什么吃什么吗？他们突然大声说，你是什么人，要你管？我说，我是首都三司的。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到你们学校去，和你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谈这个事。他们又不说话了。我接着说，走啊，前面带路，现在就去！他们两个突然以退为进，大声说，我们今天不抄了，改天多带些人再来抄。说完扭头就走，很快速地拐个弯就不见了。我对联动的抄家一向反感，我们“东方红”也没有抄过家。倒是原来的院文革、“斗批改兵团”在学校大肆抄家，烧“四旧”。

我回到屋里，我姐姐和我的表妹们还很担心，怕他们以后再来。我安慰她们说，这两个毛孩子是私自过来捞好处的。以后再有人来抄家，要问清是什么学校，什么组织，要记下来。抄了什么东西，要他们写个清单签上字，留起来。这都是符合手续的，不用怕。

## 平静的思茅

我和戴良吉在贵阳待了五六天，又搭火车去了昆明。在昆明我们住进了云南大学。昆明的文化大革命还处在初始的阶段，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可以免费乘车，可以自由地去北京串联。我有两个高中同学在昆明上大学，我去大学找他们，他们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刚刚去长征了。很是不巧，没能见面。

昆明有一种红梨，个儿很大，看起来肉很粗，可吃起来，口感很细腻，香甜可口，而且水分很多。可惜北京没有卖的。我们到滇池去玩了一天，石林就没有去。后来，我们决定去西双版纳，那是我向往的地方。在电影里看到的傣族风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来了一定不能错过。

我们坐上长途汽车，先到了思茅。思茅是西双版纳的首府，这里十分平静，还看不到有文化大革命的迹象。所幸，这里还设有接待站。我们两个住进去后，又认识了五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两个郑州的高中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到景洪去。但州政府不让去，说那里是边境，没有上级批准，不允许去，他们还在这里等消息。第二天我和戴良吉到思茅中学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一切按部就班，学生们都在上课，没有任何文化大革命的动静。等到下课了，我们和学生们攀谈，他们很关心北京的事，也问起大串联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十分惊异，他们还不相信大串联这样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学生都可以到北京去串联，而且坐车住宿都是免费的，他们更是不敢相信，好像是天方夜谭。学生们告诉我们，学校还有他们的老师，都告诉他们不能离开学校，更不让到外地去。当地的政治形势和内地的形势整个是脱节的。

我和戴良吉同清华的五个学生讨论了这里的情况，决定给思茅的当地政府写大字报，批评他们跟不上形势，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大字报贴到了州政府。引来了很多人来看，也惊动了当地的官员。他们连忙找我们座谈，询问北京的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介绍，都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很不顺耳的话。他们听着听着就有点坐不住了，觉得我们说的好像是反革命言论一样。在他们头头的暗示下，那些手下人没敢轻举妄动。毕竟顾及我们是北京来的，而他们对当前的形势又是满头雾水。他们还是以谦虚的态度向我们请教了很多他们还不明白的问题。他们问，为什么现在党中央不发指示，我们都要听中央一个文革小组的呢？我们说，因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有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听了都噤若寒蝉，不敢做声。有一个人问，现在成立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权力这么大，这几个人过去都没怎么听说过呀，陈伯达还知道一些，其他的都不熟悉。我们问，江青同志你们也不知道吗？他们摇摇头，说，也不熟悉。我只好亮出底牌，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爱人，现在知道了吧？他们恍然大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是茅塞顿开了。

几个人几乎是同时说，知道了，知道了。一副受益匪浅的表情。

清华的同学又提出了去景洪的事，他们回答说，上级回复，说景洪是边境地区，一般人不允许去那里。我说，边境也是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去呢？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就是前一段有北京来的红卫兵从那里跑到越南去了，参加抗美援朝去了。上级就来了个通知，不让红卫兵到景洪去了。我们是按上级的指示做的。我说，我们想参观少数民族的寨子，那怎么办？听了这个问题，他们绷紧的神经又松弛了下来，甚至还笑了一下，说，那容易，少数民族寨子到处都是，除了景洪暂时不能去，其他地方的寨子都可以去。我说，我们准备步行，长征，考察社会，考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们一脸轻松地站了起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欢迎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有点像会谈一样的这么一个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回到住处，接着就开始筹划我们长征的路线了。

###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离我们不远就是澜沧江，附近又没有桥可以走过去，我们必须先穿过澜沧江，才能先向北，经过临沧、保山、大理，然后折向东南，经过楚雄，再回到昆明。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样渡过澜沧江。我们跑到澜沧江边上考察，澜沧江水黄黄的，好像黄河水，但实际上它的含沙量比黄河少多了。澜沧江很安静地流着，站在高处，觉得它很平静。从高处下来，来到岸边，才发现它很湍急，有波无浪，高速地向前奔流，流速十分惊人。我们几个人，除了戴良吉能够游泳过去，其余的人都不可能游过去。我们开始想的办法是，把我们打背包的行李带接起来，由戴良吉拉着一头游过去，然后把两头都绑在树上，其余的人拉着这条绳子游过去。商议完毕，戴良吉就动手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的左胳膊上，我们用手拉住另一头。戴良吉下水了，他跳到江里，奋力向对岸游去，还没到江心，绳子就被江水冲成一个大大的弧线，巨大的后拽力，使戴良吉无法再向前进，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无法拉直绳子，反而被绳子拖着不断地向下游移去。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好放弃去对岸的努力，借着江水对绳子的冲力，回到了出发岸下游的岸边。很明显，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我们站在岸边，望着湍急的江水，苦无良策。难道我们要被迫放弃吗？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过江，例如，砍竹子，抱着竹子游过去，但太不安全。我们又想到，找周围的老乡借船划船过去，但这里的老乡没有船。他们不用船过江，他们用竹筏过江。这太好了，我们可以砍竹子，做竹筏，划着竹筏过江。主意已定，我们准备找老乡借砍刀砍竹子了。这时突然看到上游有两个竹筏正向我们这里急速地漂来，每个竹筏上都坐了几个人，都有两个人拿着竹耙子，划着水，掌控着

方向，正准备向我们这边靠岸。霎时间，就稳稳地靠在了岸边上。我一时觉得我好像处在了神话故事之中了。愣怔了一下，我们就欢叫着向竹筏跑去。

他们都是傣族老乡，懂一点汉语。我们问他们这竹筏怎么做，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说，竹筏他们用完了，不要了，我们可以拿去，连同划水的耙子一起送给我们了。耙子也是竹子做的，做得很巧妙。这个构造不容易说清楚，我借个比喻，可能会表达得清楚一点。好像我们用的伞，伞柄，他们是用一根长长的竹杆。伞面，他们用的是竹片编的，是平面的正方形，不像伞面那样是弧形的。每个边长大约一尺左右。竹竿从竹片的正中间穿过去，竹片的四个角用竹子皮拧在竹竿上固定起来。划水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用耙子扒水，不用向前扒水，因为江水本身已经流速很快了，而是向对岸的方向扒，控制住竹筏不要打横就行了。

那时还正是上午，我们当即留下两个人看守竹筏，其余人就回去收拾好行李，当天就准备过江了。把行李都带过来后，九个人（还有两个郑州的中学生），分乘两个竹筏。我和一个清华的学生划一个竹筏，戴良吉和另一个清华的学生划另一个竹筏。一个清华的学生负责照相，其余的人照看好行李，避免行李掉到江里去。

那时候也不懂得害怕，就这样匆匆忙忙就过江了。我和那个清华的同学奋力向对岸扒水，竹筏艰难地向对岸缓慢地移动，同时还在水流的作用下向下游急速地下行，组成了一个合运动。当我们到达对岸时，由于速度快，控制不住，一下子撞在河岸上，人差一点儿栽倒，我趴在了竹筏上。而另一个竹筏也是碰在了河岸上，有一个人没站稳，掉到了河里。所幸是在岸边，很快被拉了上来。我们上了岸，看了看出发地，我们的到达地至少比出发地下移了一里多地。我们很激动，很兴奋。我们很冒险，但是，我们成功了！

过了江就是过了我们这次长征的最大的坎儿，剩下的路程只是翻山越岭走旱路了，没有大河险滩了。所以这一天我们也不用赶路，就近找了一个寨子就住下了。这是一个佤族寨子。一进寨子，先找管事儿的。我们内地以前叫村长，现在叫生产队长，不知道这里叫什么，是叫寨长吗？但是实际情况却很省事儿，我们进了一家人家的竹屋（佤族人不住竹楼，是在平地上造的竹屋）。家里的主人一见是生人来了，也不多说，直接就领我们去了负责的人的家里。负责人是一个汉人，是上面派来管这个寨子的。问了几句，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是在长征，找住的地方。就很爽快地说，好办，每两个人安排住一家，你们九个人，安排五家，又指着我说，你一个人住一家吧。住谁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按规定是每人每天一毛五分钱，你们给他们一毛两毛也行，不给也行。伙食不好，就是米饭，有点青菜，没有肉。另外，这里没有厕所，在外边随便屙，这里不讲究。说完就



领着我们到各个家里去。

我一个人被安排到了一户人家里。我进了门，屋里光线不好，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没有玻璃，遮挡窗户的是用草做的草片子，用个小棍儿撑起来。竹房子的顶部也是用这种草铺盖的。一进门，有一块儿相当宽敞的地方，像内地房子的厅。平常人们就在这个厅里活动，聊天，吸烟，做饭，吃饭等等。四面墙，有相邻的两面，都有小房间，是家庭成员的住室。主人领我到了一个小房间门口，我今晚就住在这一间。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很小，但也显得精致，也有一个可以撑开的小窗户。床也是竹子做的，但是，这个床是不能移动的，它是用竹子和三面墙编在一起的，真是巧妙的设计。床上没有被褥之类的东西。这里不冷，可能也不需要吧，反正我们带有简单的行李。屋里也没有其他任何家具。我放下东西，就出来和主人说话。这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只有两口子和一个女儿。目前只有男主人在家，老伴儿和女儿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男主人懂少量汉语，我只能和他进行简单的对话。

晚上，女主人和女儿回来了。见家里有客人，微笑着点了点头，打了招呼，就忙着做饭。饮食很简单，就是糯米饭和青菜汤。按城里人的观点，营养可能不够，但糯米饭很香，很好吃，我以前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任何娱乐，所以很早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我留下三毛钱，他们笑笑，就收下了。走到门外，大家住得都很近，一出门，都互相看得见，很快就聚在一起出发了。一路走一路说着各自的感受。我说，电影上，小说里，总是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点着篝火，唱歌跳舞，通宵达旦。这里怎么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动静啊？大家都有同感，有的说，电影里的净是瞎编的，实际上，哪有这回事啊？劳动了一天，累得要死，哪还有劲儿载歌载舞呀！

一路上，自然风光不错，青山黄水——不是绿水，因为澜沧江水是黄的，满山的竹林，茂密得也是遮天蔽日。我看到竹子也分了很多种，有的竹筒很粗，长得像杨树一样高的筒竹——这是我自己瞎胡起的名字，还有细小而婀娜多姿的，我们在内地常见到的庭院竹，还有很多其它品种，都叫不出名字。

在思茅时，听说山里有旱蚂蟥，走过山里有草的小路时，就会爬到你身上咬你。我当时忙打听怎么样防止这种旱蚂蟥，当地人告诉我，穿上麂皮鞋就没事儿了，蚂蟥怕闻麂子皮的味道。我还专门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双麂子皮做的皮鞋。现在看来，还没派上用场。

山路走了一整天，我们来到一个坝子里，坝子是当地人的叫法，就是小盆地的意思。坝子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是一马平川，河水，稻田，芭蕉树，竹楼，真是人间美景。终于看到竹楼了，这里是傣族的居住地。傣族分两支，一支叫水傣，

他们是云南众少数民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居住地往往也是当地最好的，就是在盆地里。另一支叫旱傣，他们的居住地一般在半山腰。哈尼族一般住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佤族一般住在山的最高处。我们在电影、歌舞晚会看到的傣族一般都是水傣。他们的衣着一般以浅色为主，比较艳丽。旱傣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的衣着以深色为主，主要是黑色，再加上一些服饰做点缀。

我们来到坝子时已是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了，正好看到傣族同胞放工的景象。他们当天收割的稻谷就在田里打好，收工时就挑回家去。我们看到一溜溜的傣族姑娘挑着装满稻谷的箩筐走在田埂上和田间小路上，她们的白色上衣很短，下着彩色筒裙，中间露着肚皮，肩上挑着箩筐，风尘仆仆地走过我们身旁。这一担稻谷很重，我估计至少也有七八十斤吧。她们的脸色红扑扑的，散出的少许头发被汗水沾在脸颊上。噗，噗，噗，噗，她们的赤脚沉重而轻盈地踏在细沙土地上，当她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到我脚下的土地好像也在轻轻颤动着。

很奇怪，这些收工回家的人群几乎都是女性，鲜见男子的身影。难道农活都是由妇女从事吗？我很疑惑。

晚上，我们照例由寨子的汉人主管安排到各个傣家竹楼。竹楼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我沿着竹梯，好奇地喜悦地一级一级登上竹楼，心情是那样的舒畅、美妙，确是妙不可言。竹楼上的格局和我住过的其他民族的竹舍差不多，大同小异。但光线明显好多了，气流畅通多了。我住的这一家，人口也不多，夫妻两个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位女性已经去河里洗完澡回来了，换好了衣服，正在准备晚饭。傣族妇女下河洗澡是不避人的，她们成群结队地到河里洗澡，嬉戏打闹，驱散一天的疲劳。汉人很喜欢去看她们洗澡，我不好意思走近去看，只是远远地观望。她们洗澡很有技巧，她们从岸边走到河里，筒裙是一点一点往上掀的，水漫过身体一点，筒裙就往上掀一点，水漫到了腰部，才褪去筒裙。水漫过了胸部才褪去上衣。然后，有的是把衣服盘到头上，有的是把衣服递到岸边。洗完澡，穿衣服时，是反过来的程序，真是聪慧绝伦。

他们家的儿子没回来，说是去会姑娘了。他们的女儿大约十四五岁，发育得很好，比我们汉人同样年龄的女孩子显得更成熟。她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抓了好多蜘蛛，用了很多蜘蛛网把它们裹起来带回家，她说要炒熟了吃。她把锅烧热了，把蜘蛛网扯开一个口，把里面的蜘蛛倒到锅里。我看到这些蜘蛛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蜘蛛，它们好像是硬壳的，蜘蛛腿也很长，硬壳上还有花纹。那些蜘蛛掉到了锅里，感到了热，慌慌张张地往外爬，小姑娘用手一个一个地又把它们扒拉下去。一会功夫，它们就不动了，长腿也僵直地缩了起来。小姑娘把他们倒在一个盘子里，拿了一个给我吃，我不敢吃，摇摇手谢绝了。小姑娘就一个人吃，一个一个地放到嘴里，像吃花生米一样。晚饭很简单，就是糯米团子，把蒸好的糯米

用手团成团子，拿在手里吃。当地的糯米很香，不用就着菜也能吃。吃饭期间，我问男主人，为什么下地干活的都是妇女，男人在做什么？男主人说，男人只管耕田耙地，剩下的农活都是妇女干。平常，男人就是拿着猎枪上山打打猎。这里的男人真舒服，我不禁有些羡慕起来。

这里的风景好，乡土人情与内地有很大不同，我们决定在这里多住一天。

第二天，他们几个都要去坝子里转。我想去看看旱傣的寨子。打听好了离这里不远的半山上就有一个旱傣的寨子，我就一个人去爬山了。走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来到了寨子边上，看到他们住的也是竹楼，不同的是，他们的竹楼下面养着牛和猪，竹楼的周围都是芭蕉树。我就信步走进了寨子。我看到这里的竹楼在楼梯顶端和门口之间还有一个宽敞的地方，像内地的阳台一样，有竹椅子摆在上面。这真是个聊天喝茶打牌下棋的好地方，我很欣赏。

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想和他们说话。走近了，看到是几个带小孩的妇女在楼梯口那个类似阳台的地方聊天，她们都没有穿上衣，上身完全裸露着，没有乳罩（傣族妇女不戴乳罩），乳房也完全袒露着。她们怀里抱的孩子都很小，有的正含着奶头吃奶。她们看到了我这个外地人，露出很惊奇的神情，接着就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不敢走近前去，只感到她们的上身是白花花的一片，不好意思看她们，怕别人说我有不健康的思想。就这样僵直地站了一会儿，我好像被自己强制着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走走停停，观察着寨子的结构和布局……

下午，我回到坝子里，见了我们长征队的同伴，交流着彼此的见闻。他们在坝子里转了一大圈，把美景看了个够，还顺着河走了很长一段路。这里的小河，水流平缓，河水清澈，不像澜沧江那样浑浊，而是呈淡淡的绿色，很是漂亮。他们略带遗憾地说，我们想参观一下傣族妇女在河里洗澡的场面，可惜没有看到。我说，人家洗澡是在傍晚，收工以后。这大白天的，谁去洗澡？我给他们述说了我的所见，他们也啧啧称奇，后悔没有跟我一块儿去。我们说好了明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出发，争取在明天傍晚前赶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是一个哈尼族的寨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就出发了。一天基本上都是上坡路，比较辛苦。我们一人砍了一根细竹子做拐杖，上山可以省点劲儿。山间小路曲曲弯弯，路边的小草还挂着露珠，空气十分清新。路很窄，无法并排走，我们九个人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走着走着，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了，紧张地说，蛇，一条蛇拦住路了，不让过。后面的人一阵紧张，都停了下来。一个大胆的清华学生说，我去看看，不用紧张，我看看是什么蛇。他拿着竹竿挤到前面去了，其他的人都停了下来，等着他，看他怎么处理。我听到他说，这条蛇横在路上，昂着头看着我，看样子是不想让我们过去。我说，那怎么办？蛇大不大？他说，蛇倒是不大，可尾巴是

秃的，可能是毒蛇。我刚想说，那怎么办？要不要绕路？就听见啪的一声，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声。然后是他略带紧张的声音，没事了，被我打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挤了上去。我看到一条绿色略带灰色的蛇横在小路上，大约有一米那么长，蛇脑袋快被打破了。大家在议论到底是不是毒蛇，我说，尾巴有点秃，像毒蛇。可颜色又不太鲜艳，不知道是不是毒蛇。一个老大哥说，管它是不是毒蛇，反正拦路的都不是好蛇。走走走，赶路要紧。大家又哈着腰拄着竹竿，呼哧呼哧地赶路。

终于，我们在下午五点以前赶到了哈尼族寨子。管理寨子的汉人又为我们安排住处。我问他，都说少数民族在晚上点着篝火，跳舞唱歌。怎么我们经过的寨子都冷冷清清啊？他很干脆地说，跳舞唱歌，那是“四旧”，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就破掉了。我说，这怎么是“四旧”呢？都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他见我反驳了他的说法，又说，是不是“四旧”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说，我们这次长征，就是考察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下，晚上让我们看一下民族歌舞？他看了我一眼，犹豫着，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就是想考察一下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他又看了我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我去安排，你们吃过饭就到场上来吧。吃罢饭，我们九个人都来到了晒场上，看见了十几个小姑娘，都是十三四岁，一个成年人都没有。我问那个管理人，怎么都是小孩子？大人呢？他嘿嘿一笑，说，大人干了一天活，都累了，小孩子也会跳舞。我也不再追问他，毕竟有小孩子跳舞也可以。

我们期盼的少数民族歌舞晚会就要开始了。小孩子们先是排成了一排，手牵着手，唱起了歌，跳起舞来。队形也不断变换，手拉着手，一会变成了一个圆圈，一会又变成两排。歌曲的旋律比较简单，听几遍后就可以跟着哼哼了。舞蹈动作也不复杂，甩手，抬腿，转圈等动作，都比较朴素，远没有专业演员表演的歌舞那么优美。这是两个范畴，一个是自然和朴素，一个是加工提炼和雕琢。我们看了一会儿，也纷纷加入了队伍，跟着比划着也跳了起来。跳了一会儿，又变换了队形，变成了脸对脸的两排，对面的两个人拉拉手，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又松开手，在各自的脸旁拍拍手。这时，我对面的小姑娘把她的两手搭在我肩上，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吓了我一跳，她两手扒着我的肩一用劲，身体往上一跳，两条腿就夹住了我的腰，两个脚腕在我的腰后就搭在一起了。我连忙用手推她，示意她下来，心里又紧张了一次。她跳下来了，我示意她和她旁边的小女伴一起跳给我看。她很机灵地就懂了我的意思，转向了她的小女伴，两个人一起跳给我看。原来这个舞蹈动作是，女方跳起来用两腿夹住男方的腰，男方用两手扶着女方的后背。女方腾出两手，在自己脸颊的两旁分别拍拍手，然后再跳下来。这个舞蹈动作还是蛮有创意的，我能够想象出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这些流传了千百年

的歌舞也算“四旧”吗？也算“资产阶级”的东西吗？不能吧！

这是我们整个长征路上看到的唯一的一次由少数民族自己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

我们继续北上，但基本上已是汉族居住区了，沿途已很少在少数民族寨子里居住了。长征队的其他人怀念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他们决定再重返西双版纳，不想再继续北上了。于是大家分手，我和戴良吉继续按着原来的计划前进。一路上确实比较乏味，只是为了到大理看看白族的风貌，才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

到了大理，到了白族居住区，竟然没有进入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感觉，因为白族和我们汉族比较起来，除了服饰有些不同，而且主要是女性的服饰和汉族不同，男性平时穿的衣服也和汉族一样。其他的方面和我们汉族也没什么区别，讲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没有什么民族特点。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就不想再住下去了，很快就回到了昆明，又很快回到了贵阳。戴良吉决定在他哥哥家多住一段时间，而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这次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其时已经是元月份了。

## 上海之行

回校以后，我的几个小伙伴程希平、王白沙、童隆美、石白河听我讲了大串联的经历，很是向往，一个劲抱怨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去。我说，我敢吗？把总部的骨干带几个走，朱头不骂死我。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逍遥派了，现在可以带我们出去了吧？我说好，我在北京待几天，然后我们就走。

1967年初，我和几个好伙伴开始准备外出串联的事，王白沙是地院附中最早加入地院东方红的，所以她是附中东方红的负责人，也是地院东方红总部成员。她父亲是王光美的四哥，所以她叫王光美姑姑。她对我说，她妈妈听她说要和我一起去串联，想见见我。要我晚上跟她一起到她家里去，我就跟她去了。

她家住在红霞公寓，是一个在王府井附近的高级住宅区。我到了他们家，见了她妈妈。她妈妈很和蔼，拉了些家常，又问了我大串联的情况。坐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怕误了回学校的公交车，就告辞了。后来王白沙告诉我，她妈妈说，我跟着你去大串联她很放心。此时，上海已经发生了一月夺权风暴，这一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我的伙伴们商量，上海我们都没有去过，不如我们先去上海去，在上海玩几天，顺便看看上海的形势。接着先玩江南，再到广州，然后再去云南。等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我想到这次一出去就得几个月的时间，想先拐到家看看。临时决定我和程希平先到郑州，停两天，再去武汉，然后乘船到上海。王白沙、童隆裴和石白河，直接从北京到上海，我们在上海会合。

我和程希平一起到了郑州，住在我家里。我父母除了被人贴了不少大字报以

外，别的倒也没什么，还算平安。我觉得我有两年没见到我修哥了。修哥是我大姨的孩子，我贵州梅姐姐的弟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想见见他。我只知道他在密县地质队工作，并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我想密县并不大，干脆先去密县，到那里再打听。就和程希平一起坐火车到了密县。结果到了密县一问人，谁都不知道地质队在哪里，说地质队都在山沟里，不在县城。浪费了我们一天时间，也没见到我修哥。我们当天又从密县回到了郑州。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等我再见到我修哥的时候，竟会是在十多年以后。

第二天，我和程希平乘车到了武昌，住在邮电学院。我和程希平到长江大桥看了看，在那里转了半天。下午我们又转到了汉口，打听到汉口有一个叫六渡桥的地方比较热闹，就坐公共汽车去六渡桥。上了车，我对售票员说去六渡桥。结果售票员听不懂，我拿出了写有六渡桥的字条，售票员才明白，说，哦，是漏斗桥。我听她说的六渡桥的发音像漏斗桥，那个桥字的发音还向上扬。中国的语言真有意思，方言太多，差不多一个地方一种方言。幸亏文字是相同的，要不然真麻烦。我们在汉口码头办好了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我们提前到了码头，顺利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船。

我是第一次坐这样的客船，感觉挺新鲜的。我们的客舱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一张床，都是上下铺。船上还有洗澡的地方，吃饭还有专门的餐厅。我感到很舒服也很好奇，我到船上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到处转悠。船到了黄石，因预报船在黄石停的时间不长，我们没有下船。我转到船的下层，站在船边看江面上的风景。忽然看见一艘小的快艇从上游驶来，靠在了客船的边上，从小船上下来了几个人，登上了客船。我感到很奇怪，就注意地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进了船上的广播室，有一个人留在广播室的外面，像是个把门的。我就上去问他，你们是黄石的？他说，不是，我们是武汉的。我说我看到你们是坐着小船来的，不是黄石当地的吗？他看了看我，看到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也不避讳我，说，我们是开快艇从武汉追过来的。有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坐上了这条船准备跑到上海去，我们在这里拦住他，现在要抓他回去。我说，怎么抓？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吗？他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船上的广播响了，说，××同志请注意，您的东西掉了，请您到广播室来领取。一连广播了好多遍。当时的形势是，各地各单位都是派别林立，某一派占了上风就去抓另一派的人。我可以救这个人，我只要站在上面的楼梯口，看到有人想下来，告诉他不要下来就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万一真是坏人呢？所以我只好袖手旁观，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又广播了几遍。又等了很久，下来了一个人，进了广播室。一会儿，这个人被几个人簇拥着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这个人被他们拥着上了小船，小船很快就开走了。小船离开以后又过了

十多分钟，我们的船才启动。我们坐的客船因为这个事，延误了两个多小时。

这件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问自己，我应不应该救这个人，万一他是个好人呢？另一种想法是，也可能他就是坏人呢？真是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到了上海，我们两个就和其他三个伙伴会师了。我们住在地质东方红在上海的联络站，这是一座小洋楼。据说这里原是某个外国，可能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所在地。领事馆的人员可能撤走得较匆忙，还遗留了一些小东西。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留下的飞镖和靶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具，十分喜欢，我每天都会抽时间练习在靶上投掷飞镖。我的小伙伴们也喜欢，但是都没有我的兴趣浓。我们东方红常驻上海的代表徐娟娟，看到我喜欢，就收集了一下，大约有六七个，全部给了我。

我没想到蒋良朴和杨雨忠也来了上海，很高兴在上海又见到他们。杨雨忠是上海人，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执意要请我和蒋良朴到他家里吃饭，那一天，我和蒋良朴跟着他到了他的家。杨雨忠的父母都是上海的工人阶级。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母，两个老实巴交善良好客的叔叔阿姨。他们亲自下厨做了几个上海菜，端上了自己酿制的米酒。米酒酿得非常好，口感宜人，我和蒋良朴每人喝了一大玻璃杯。上海家常菜也非常可口，清淡而不咸不腻，我觉得比河南菜好吃，河南菜有些偏咸。米酒的度数感觉不高，没想到喝完以后，竟迷迷糊糊地想睡觉。杨雨忠连忙安排我和蒋良朴在他的房间小睡一会儿，我和蒋良朴躺到了床上就沉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下午五点多。结果是，杨雨忠和他的父母已经做好了晚饭，坚持要我和蒋良朴在他们家吃晚饭，我和蒋良朴又在他家里吃过晚饭才回去。杨雨忠和蒋良朴来上海是干革命的，所以他们又忙着干革命去了，我后来就很少再见到杨雨忠和蒋良朴了。我来上海是看革命的，所以我空闲时间就多，我和我的伙伴们每天在上海溜溜达达。后来有一天，杨雨忠和蒋良朴对我说，朱头叫他们尽快回北京。他们两个就马上回北京了。

接下来就该我们去大串联了，可我心里总觉得有个什么事儿放心不下，这种感觉怪怪的。这时，我的四个伙伴已经找到了学工的活儿，在一艘货船上除锈和刷油漆。我和他们在船上干了一天。船上的人说，这艘船很快就会开往大连，在大连卸了货，再装货回来，前后得十来天时间。我想，我何不利用这十来天的时间，回一趟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到上海，和我的伙伴们会合，再安心心地去串联呢？

主意已定，我就对程希平、王白沙、童隆裴、石白河说，你们先跟着船去一趟大连，我利用这个时间回北京看看，如果北京一切如旧，我就赶回上海和你们会合，咱们再安心心地去串联。程希平和王白沙说，管它北京有什么事呢，我

们串联我们的。按说，我们已经逍遥了，那就逍遥呗，北京就是翻天覆地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我当时心里就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北京要出什么事了，想去看一看才觉得安心。现在再回首往事，我已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劫数，我是在劫难逃。但在当时，我还是坚持说我要回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来。伙伴们看我主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同意我回北京，并嘱咐我早去早回。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好朋友好伙伴，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北京的征程。

回北京不久，朱成昭出事了，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我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出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的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 南下广州

朱成昭的事基本上告一段落，王大宾正式成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地质东方红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前行。我又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和伙伴们去大串联了。但是大串联当时在全国已经停止了，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的条件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学生再想去周游全国已经不可能了。

当时梅建明和杜金山已经去了东方红广州联络站，我一个人待在学校感到非常乏味。梅建明和杜金山建议我到广州去待一段时间，我对广州印象不错，也想故地重游，于是我便去了广州。

广州的东方红联络站设在广东省地质局。梅建明和杜金山都住在地质局招待所。我开始也想住在那里。但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当时在广州的中南局工作，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姑姑说，傻孩儿啊，住在那里怎么行啊，吃又吃不好，住又住不好，就住在家里，这里离地质局又不远，走路去就行了。于是我就住在了我姑姑家，每天走路到联络站去。

当时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报纸《东方红报》在广州发行，从北京发航空版到广州，在广州印刷后发行。每份卖2分钱，很多地派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地去卖报纸。他们从联络站领了报纸到大街上去卖。地质东方红在广州的影响很大，地派的实力也很大。我们的《东方红报》很好卖，每次出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卖完了。后来我和那些自愿卖报纸的中学红卫兵混得很熟了，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儿就开始和我开玩笑，她看我戴了副眼镜，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四眼狗，而且是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搞得我还一时找不到办法对付她。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问她，白毛女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是拔毛内。我学会了。我又请教她，胖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是肥。我又学会了。然后我把学会的话组合



起来，组合成了白毛肥女，我会用广东话说白毛肥女了，这样我就有了对付她的武器。当她又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的时候，我就用广东话叫她白毛肥女。她大吃一惊，气愤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还会用广东话骂人。我说是跟你学的，你骂我，我就骂你。你不骂我了，我就不骂你了。以后，每逢她叫我一句四眼狗，我就回敬她一句白毛肥女。几次以后，她就和我讲和了，从此不再用四眼狗骂我，我也不再叫她白毛肥女了。接下来就是大家友好相处，相敬如宾，玩笑照样开，但是不过分。

地派在广州的影响很大，还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差不多每周都有文艺演出。梅建明和杜金山和这些文艺界的演员很熟，梅建明和杜金山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其中有大辣椒，小辣椒，还有一个广州歌舞团的小高，她们都是舞蹈演员。后来我和她们也熟悉了，还认识了一位独唱歌手叫朱敏。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分派系，两派也辩论，但是基本上不搞武斗，我对这一点还是比较欣赏的。梅建明后来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只剩下我和杜金山继续留在广州。梅建明走了以后，《东方红报》卖报的经费就由我保管。又过了一段时间杜金山也回了北京。广州就剩下我一个人。

###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我在广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也觉得无聊。我也回北京了。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再乘公交车去学校。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了。我心里还提醒我自己，到明天别忘了把报费交到报社去。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张华清，他小声对我说，朱头找你，叫你去一下。我说，太晚了，明天吧。张华清说，他现在在小梅家，在等你，叫你现在就去。在屋里说话怕影响别人睡觉，我只好穿上衣服，跟着张华清来到宿舍外面。我说，又没有什么急事，明天去不行么？张华清说，就是有急事才来叫你的。他们明天就要出去串联了。刚知道你今天回来了，叫我来叫你。要不然他们明天就走了。刚好我的小行李背囊还没有打开，我就回到宿舍提了小背包就跟着张华清走了。张华清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就去了梅建明家里。到了小梅家里一看，朱成昭和小梅都在那里。朱成昭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会在广州待上一段时间呢。我说，一个人住那儿没意思就跑回来了。你们准备去哪里串联啊？朱成昭说，先去上海待几天，然后去广州，在广州玩几天，就去西双版纳。你不是说去西双版纳玩你当向导么？我说，你们要去广州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要知道你们要去广州，我就不回来了。朱成昭说，主要是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所以没通知你。蒋良朴、李尤江、杜金山和叶

向真今天刚走，去广州找你去了。结果你跑回来了，两岔了。我说，那你们先去上海吧，上海我去过了，我就不去上海了。我休息两天，然后我直接去广州，在广州找你们。梅建明说，这么晚了再跑到学校去？再待一会儿天就亮了，吃点东西就该去车站了，还折腾什么？一块儿走吧。朱成昭说，车票还差一张，华清先不去吧，先让狗头（我的绰号）去。过几天再办一张去广州的票，华清可以直接去广州找我们。朱成昭又问我，你在广州卖报的报费带回来没有？我说，带回来了，我准备明天就交到报社去。朱成昭说，你看现在我们都没有经济来源，这次出去串联肯定花费不少，能不能先用一下这笔费用，以后由我出面归还。我当时不懂得通融，直截了当地说，那不行，这是公款，由我经手保管，我要负责交回去。串联的费用，我们得自己解决。朱成昭看了我一眼，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那这样吧，费用等我到上海后筹措一下吧。后来我们几个人说话一直到天亮。我们在梅建明家简单吃了点儿早餐，然后就去了火车站。张华清一个人回到了学校。

直到几十年以后，在 2014 年，我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有一次闲聊，在谈到往事时，王大宾问我，你和朱成昭那一次出去串联，之前，朱成昭曾经给东方红上海联络站的庄一龙打过电话，说要借 3000 块钱的卖报经费用一下。庄一龙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欠条也预先写好了。朱成昭过去签个字就可以把钱拿走了。怎么后来没有去拿呀？那个借条现在还保存着呢。我才突然回味过来，我推测事情应该是，在我没有从广州回北京以前，朱成昭原准备从东方红上海联络站借报费的，所以先打电话给庄一龙，让他先把钱准备好，等他到了上海去拿。后来我回到了北京，朱成昭就想就近从我这里借报费，没想到被我一口拒绝。他并没有责怪我，可能是我的态度触动了他，他到上海后根本就没有去找庄一龙去拿钱。那应该就是他当时就决定不用公款了。那肯定是他自己家里筹措了一些钱。我们去串联一路上花的钱，实际上是他从家里筹措的钱。我当时当着王大宾的面不觉眼睛就湿润了。朱成昭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他在大节上是光明磊落的，人格上是使人钦佩的。我十分悔恨我那时的死板脑筋，竟没有把我保管的报费拿出来帮我的难友们度过那段困难时期。后来我精心保管的报费还有我自己的积蓄被学校专案组的李士田一股脑儿地掳了去，真不如我们在串联的时候痛痛快快地花了它。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王大宾听，王大宾也唏嘘不已。当时蔡派们污蔑朱成昭带着什么机密数据要叛国外逃，真是一派胡言，哪有这回事？

##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我们到上海后，在朱成昭家里停留了两天，然后就去杭州，准备去游灵隐寺和西湖。到杭州时已经是晚上了。出了火车站，我们不知道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看见有拉三轮的，就问他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三轮车夫说，呵，那远了，走路是不行的，我拉你们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天已经很晚了，就决定坐三轮车去地质局。一辆车五块钱，我们三个搭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拉着我们晃悠悠地走，三轮车夫一路上还和我们聊着天。觉得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地方。我觉得这么远啊，真不亏花了五块钱。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招待所吃完了早餐，地质局的人说领我们出去转转。出了门，刚拐出一个路口，就看见一个大广场。我觉得怎么这个地方有点眼熟啊，就问，这儿怎么和火车站这么像啊？地质局的人说，什么像啊，这儿就是火车站啊。我们听了，都愣了，说，昨天晚上我们坐三轮车走了半天才到，现在一看怎么就在跟前啊？地质局的人一听就笑了，说，哎哟，你们上当了。他们是为了赚你们的钱哄你们的。其实根本不用坐车，就在火车站旁边。我仔细想想，拉三轮车的人为了赚这五块钱，拉着我们转了半天，走了那么远的路，多累啊，赚点儿钱真不容易呀。

我们在杭州看了灵隐寺，游了西湖，又专门去虎跑泉去喝了龙井茶。一杯茶三毛钱，当时还觉得挺贵的。小梅（建明）是喝茶品酒的专家，他品着茶说，好茶，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龙井茶，也是当地产的上好的龙井。三毛钱，值。

我们还跑到钱塘江去看钱塘潮，但当时没有潮。我们就跑上钱塘江大桥，准备照相留念。小梅刚拿出相机准备照相，我们还没有站好，一个佩枪的解放军战士就走过来了。他对我们说，这里是军事禁区，禁止照相。我感到不解，不就是一个大桥吗？怎么连照相都不准呢？但我们还得听解放军的，就没有照相。我们在杭州玩了两天就又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湖南境内。我们看到有一条大河并行在铁路旁边。有很长一段时间，火车一直顺着河边走。朱成昭说，湖南有这么大的一条河，不知道这条河是不是湘江。咱们下去看看吧，我想下去游泳。我们就在一个叫耒阳的小站下了车。走到了江边，当地可能刚下了大雨，河水浑浊，河面十分宽阔。朱成昭和小梅都是游泳能手，跳到河里就游了起来。我不善于游泳，就没有下水，站在岸上观看。玩了一阵，又在这个小火车站等下一班去广州的车。等到下一班去广州的车来了，我们并没有这班车的票。我们先上了车，让列车员看了看我们上一班车的票，又说了说情况，列车员就叫我们坐在那里了。第二天上午，火车快到广州时，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停了很久都不开。我们问列车员什么时候开车，到广州还有多远，列车员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什么时候开车还不知道，前面好像出什么事了。我问列车员，你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这里有公交车到东山吗？列车员说有。我和朱成昭、小梅他们商量说，这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不如我们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去。

于是我们下了车，改乘公交车去了广州市中心地区。

到了广州东山，先到了我姑姑家小歇片刻，大家也顺便认认地方。接着小梅就打电话给马万祺的二公子，我们都叫他二马，请他当导游领我们在广东旅游。朱成昭电话联系上了叶向真、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约他们到我姑姑家会面。在我姑姑家大约待了一个多小时，约来的人都到齐了。小梅给二马讲了我們准备游广东的风景名胜，请他帮我们设计一下行程。二马说可以先游一下广州附近的西樵山和从化的温泉，然后再游肇庆。当下决定先去游西樵山。

我们八个人随后就乘车去了西樵山。西樵山风景秀丽，到如今还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西樵大饼。西樵大饼是当地的一种食品，类似北方的烧饼，但口味和北方的烧饼完全不同。二是山顶的一个湖泊。就在山顶的中央有一个大湖泊。我怀疑这里在远古时期可能是个火山口，后来成了湖泊。只是猜测，还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三是半山腰有一个溶洞。溶洞里是一池清水，十分清澈透明，十分平静，没有一丝波纹。目视可以看得很深很深，深不见底。这个洞十分迷人，小梅和朱成昭想跳下去游泳。我看到这水异常清澈平静，竟怀疑这水的比重是不是有问题。我让他们稍等片刻，我去洞外找了一块大石块和一根小树枝，然后进到洞里。我先把大石头投到水里，噗通一声大石头就掉进了水里，只见大石头晃晃悠悠向水底沉去，一直到大石头小得看不见了，仍然见不到水的底部，可见这水是极深的。我又把树枝抛到了水里，树枝也稳稳地飘在水面上，可见这水并无异常，我才放下心来。我对他们说这水就是普通的水，只是太清了，其他并无异常，可以下去游泳。于是小梅和朱成昭跳下去畅游了一通。西樵山一游，二马全程导游，不辞辛苦。全部费用，二马一人承担，十分义气。我们在西樵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床后，吃了早餐就动身回广州。在当天中午刚过就回到了广州。约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从化温泉，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

###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我们在广州玩得高兴，却不知在北京我们学校已经炸翻了锅。蔡派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朱成昭从北京走了，并危言耸听地散布说，朱成昭逃跑了，而且连夜把我也带走了，甚至煞有介事地说，朱成昭带了机密文件去叛国投敌了。他们连番地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举报，把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也搞得十分紧张，连忙指示广州警备区查找朱成昭等人。中央的办事效率很高，很快查到了我的姑姑和姑父在广州中南局工作，又很快地找到了我的姑父。他们询问我姑父有没有见到我们这几个人。我姑父说，有啊，他们昨天来的，已经到西樵山旅游去了。他们

叮嘱我姑父，等我们一回来要马上通知他们，并且要对此事保密。但是我们当时对此还一无所知。我们中午回到广州后，把随身物品往我姑姑家一放，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去了。我和杜金山就去了地派的文艺宣传队，看了看我们的老朋友，小高（高慧兰），小辣椒（易韵仪），大辣椒（潘淑仪）和朱敏等人。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说了说北京的情况和我们这次在广州游玩的大致安排。我们在那里聊了一会儿天，我和杜金山就告辞回到了我姑姑家。

一进门，没有看到我姑姑和我姑姑家里的人，客厅里坐着两个年轻的军官。这两个年轻军官见了我们进来，他们就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州警备区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特地来请我们到警备区招待所去住。我有点怀疑，说，我们几个学生是来玩的，怎么可能会中央出面叫你们来找我们去你们那里住呢？他们说，我们只是奉命办事，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广州警备区自己的决定，我们是奉中央的指示请你们过去住的。我说，我们还有好几个人没回来呢，等他们回来了一块儿去。他们一笑说，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回来得晚，我们是专门接你们两位的。我听到朱成昭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也不再说什么，我和杜金山分别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就坐上了他们的吉普车跟着他们去了广州警备区招待所。我当时心里十分疑惑，怎么我们几个普通学生出来旅游，中央还会管这种事呢。

到了警备区招待所，见了朱成昭、小梅等几个人，他们也是分别回到我姑姑家后，被分别接到这里来的。接我们的军人说，这里条件不错，你们安心在这里住下，我们听从中央下一步的安排。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我们定好了明天要去从化温泉玩的。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请示以后再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吃罢早餐，回到房间没一会儿，就听见招待所大门口处有很多人一起在喊“小梅，小梅”，“杜金山，杜金山”，还有我的名字。我们正感到奇怪，一个军官匆匆赶了过来对我们说，门口聚了很多红卫兵，怀疑我们把你们绑架了，要求我们放人。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请你们出去向他们解释一下吧。于是，小梅、杜金山和我一起来到了大门口。一看，都是地派的造反派，有几十人。他们看到我们出来了，显得很高兴，围在一起说话。原来是昨天下午，小梅他们几个被接到这里时，在大门口一下车，正好有个地派的红卫兵从这里经过，他认识小梅。他看到小梅他们几个人被军车拉到这里，怀疑是被绑架来的，就躲在旁边看动静。没多久，又看见我和杜金山也被军车和军人送过来了，更是怀疑我们是被军队绑架了，连忙到总部报告了这个情况。于是地派红卫兵总部就在今天早上拉了一车人来，要求放人。经我们解释，知道了没什么事，是一场误会。说了一会儿话，他们就回去了。

陪我们的军官看到事情圆满解决，没闹成大事，也显得很高兴。过了半个小

时左右，那个军官又兴冲冲地跑来了，说，你们想去从化参观的事，经请示，上级批准了。现在就带你们去从化参观，中午在那边吃饭。我们都很高兴，把行装一整，坐上车就出发了。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广州警备区设在从化的招待所。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行装往各自的房间一放，就来到了食堂。餐桌上摆上了一桌子菜，很丰盛。陪同我们的两个年轻军官在接待方面十分得体，每个菜都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吃饭时，他们也是灵活地观察着客人们吃饭的情况，很优雅地在盘子边上夹菜吃。我们这七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胃口好，饭量大，也不讲究什么礼节，就狼吞虎咽起来。那两个年轻军官看看我们这吃饭的架势，担心菜不够吃。他们就很少动筷子夹菜了。我注意到他们俩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只吃饭，基本不夹菜吃了。有一盘菜，叫苦瓜牛肉，我吃了一口，感觉很苦，就问，这个菜怎么这么苦啊？是不是坏了？年轻军官一笑说，不是坏了，这是苦瓜，味道就是苦的。我们之中，只有蒋良朴吃过苦瓜，他是湖南人。蒋良朴说，苦瓜，就是吃它的苦味的，好吃。剩下我们几个人都吃不惯这个菜。我们这几个人的食欲之好，饭量之大，出乎意料。我估计那两个年轻军官可能没有吃饱。随后可能他们通知了食堂，要加大菜的分量。因为随后几餐，菜的量明显增加了。

下午，陪同我们的两名军官带我们去参观毛主席在从化的一个疗养地，其实就是行宫。那是一个两层的中式楼房，楼房是封闭着的。我们只能绕着楼看看外围，趴在窗子上透过玻璃看里面的情况。里面的家具全是仿古的中式家具。楼房周围有很多开花的树木，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每颗树的树枝上都挂了许多的小玻璃瓶。我不解其意，问那两个军官，才知道因为广东的蚊虫较多，那些小瓶是装驱蚊油用的。平常不装，只有在毛主席来往的时候才把驱蚊油装进去。我感到吃惊，这么多小瓶，有很多还挂得很高，怎么装啊？得多少人去装啊。这个住宅区并没有围墙，但是它的外围种了一圈细藤条。这些藤条有手指粗细，种得十分紧密。藤条并不是只栽了一层，而是几层，密密麻麻。不要说人，就是大一点儿的老鼠都钻不进去。而且整个住宅区周围数里之内都看不到有任何住家。军官告诉我们说，这里只有毛主席来了才能住。其他人，包括江青同志单独来了也不能住这里。随后又领我们去看了刘少奇的别墅（我们就叫别墅吧，其实也是行宫）。刘少奇的这栋楼是西式风格的建筑，阳台及里面的家具设施也都是西式格调，外围设施和毛的差不多。两个地方大约相距有几公里。最后，我们又去看了准备给林彪盖的疗养地。但是那里才刚刚打了地基，完全还看不出规模。距刚才看过的那两个地方也有几公里。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看不到动工的迹象，好像已经停工了。

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当地的一些风景名胜，下午就回到了广州。到了广州，

我们还住在原来的招待所。这时，小梅的大哥梅项明已经来到了广州，要接小梅回北京。原来是中央有关部门向小梅家里通报了情况，小梅的大哥就连忙赶到了广州，接小梅回家，用以向上面显示配合之意。但是小梅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其实还想在广州多玩几天，但小梅这么说了，我就不再留恋广州，痛快答应和他一起回北京。项明大哥随即买了当天晚上回北京的车票，三个人当晚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火车很慢，到北京差不多要两天两夜。我们在车上无聊，项明大哥就教我和小梅打桥牌。我发现我对桥牌很感兴趣。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时期，中国兴起桥牌热的时候，我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我的桥牌启蒙老师就是项明大哥。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也乘火车回到了北京。而朱成昭和叶向真则是中央安排坐飞机在第三天回到了北京。

## 南京印象

我们回到北京后，又过了一段枯燥单调的日子。杜金山想回家看看他的父亲，他的家在南京。南京我没有去过，就决定跟他一起去南京，探望他的父亲。杜金山的父亲患了精神病，在南京精神病院住院。杜金山打电话联系了精神病医院，约好了探视时间。我就和杜金山一起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的门是个铁门，进出检查十分严格。病房的门平常都是锁着的，病房的窗户全部安有铁栅栏，看起来像个监狱。我感到很不舒服，就问杜金山，你父亲不能在家里养病吗？一定要住在这里吗？杜金山叹口气说，我们家里没有人能照顾他。你看，我在北京上学，我姐姐在北京工作。在南京的家人也都在上班，没有人能整天陪着他。不住在这里又能去哪里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难受，却又无能为力，不禁哀叹，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对南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绿化得好，路两边都是树，以法国梧桐最多，走在路上感觉很舒服。另一个是物价低，那时全国的物价都低，但我还是对南京的物价很满意。我在街上转悠的时候，看到街上开的私人小饭馆，就进去吃饭，一饭一菜一汤，才三毛钱。饭随便吃，菜是青椒炒肉丝，汤是西红柿鸡蛋汤。味道好，吃起来很舒服。我在南京待了几天就回了北京。杜金山说他还想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晚一点再回北京。

## 到海边去

我回北京后，仍然是无所事事，既不上课，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实在是无聊

透顶。就和小梅、张华清结伴去外地转转。我们决定先去张华清的老家山东荣成的海边去住一段时间。

我们先到了青岛，住到了小梅的二哥昌明的家里。小梅的二哥和二嫂都在青岛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后来昌明二哥成了那个大学的校长。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是八月份，天气很热。晚上我们跑到海边去游泳，游完了才睡觉。第二天去栈桥玩，我们看到离岸很远的海面上用大型浮标架起的一排大标语，“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小梅想游到那里去，我也很想游过去，但我学游泳还没有多长时间，担心游不到那么远。小梅说，没事，你如果游不动了，我就拖你回来。为了验证他能不能拖动我，决定先试试。我就扬脸飘在海面上，小梅拖着我的一只胳膊拖着我移动，我感觉还可以，就跟着小梅一起跳到海里，向海里游去。张华清先不去，在岸边看衣服。等我游回来，他再跟着小梅一起游过去。我用的是狗刨式，游得很慢。小梅耐心地游在我身边，慢慢地陪着我游。估计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游到那排大标语那里。标语是架在由很多大竹子做成的浮标上的，浮标由一些铁链子拉着固定在海底。我们坐在浮标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又跳下水向岸边游去。又游了很长时间，好容易游上了岸。张华清说，游得那么慢，我都在这里等烦了，都三个小时了。随后由我在岸边看衣服，小梅又陪着张华清向海里游去。我站在岸边看他们游，果然觉得他们游得很慢。我把衣服收到一起裹成一团，提起衣服在岸边到处转。转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他们开始往回游了。一直看到他们快回到岸边了，我才走过去等他们。我和张华清都不怎么会游泳，这次是我游的时间最长，也是游的距离最远的一次。

两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张华清的老家。那是一个紧靠大海的村庄。张华清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老家只有他舅舅一家人了。我们住在他的舅舅家里。张华清的舅舅十分好客，和我们很谈得来。离村庄很近，就是一片浅海，大片大片地方的海水只有一米多深左右，盛产螃蟹。华清的舅舅说夜里带我们去扎螃蟹。

到了后半夜，我们划着小木船去了浅海。船头上吊着一个大汽灯，十分耀眼十分明亮。加上海水本来就很清澈，所以海底的水草、沙石、螃蟹、鱼类，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用来叉螃蟹的工具是小鱼叉，鱼叉很简单，就是一根棍儿或一根竹竿，在头上绑一个铁做的三个齿的或一排齿的叉头就行了。我们每个人拿一柄小鱼叉，华清的舅舅站在船头，我们分别站在船的两侧，看到有鱼从船边游过就用鱼叉去叉。看到海底有螃蟹在爬，也用鱼叉去叉。叉到了鱼或螃蟹就丢到船舱里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螃蟹的交配季节，看到很多两个螃蟹摺在一起的情况，下面是个个头比较大的螃蟹，上面驮了一个个头比较小的螃蟹，可能是在交配。我看到两个摺在一起的螃蟹，不忍心去叉它们，放了过去。华清的舅舅看到了，毫不犹豫地一叉下去，一叉就叉起来两个。那天夜里我们还叉到了一条一尺多长、



长得像鲨鱼一样的鱼，我们叫它小鲨鱼，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鲨鱼。黎明之前，我们已经叉了很多螃蟹和鱼，困意也上来了，我们准备回去。四周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如何辨别方向，如何在这四周没有参照物的浅海中找到回家的路。华清的舅舅十分了得，他竟然可以在看不见周遭环境的黑暗之中，仅凭着感觉，不需要任何仪器来定位，就把船划回了自己村庄的岸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刚开始消退，东方显现出一抹浅浅的鱼肚白色。

到了家，我们已经困得要命，眼皮子几乎抬不起来。我、华清和小梅，到了屋里倒头便睡。而华清舅舅一个人在剖鱼蒸蟹，准备早餐。等华清舅舅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一觉，顿时又感到体力充沛，食欲也大开，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准备享用这地道而丰盛的海鲜大餐。华清舅舅蒸了一大锅螃蟹，煎了几条鱼，调了一盘自己腌的咸萝卜丝，摊了一摞山东煎饼，还熬了一大锅玉米面粥，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味可口的早餐。吃早餐期间，华清舅舅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天，是螃蟹最瘦的时候。如果我们十月份来，那时的螃蟹很肥，比现在好吃多了。我、小梅和华清，兴趣盎然，不住地说，我们争取十月份再来，尝尝秋末肥蟹的味道。

我们在华清舅舅家住了几天，准备前往大连了，这是我们出发时计划好的行程。从大连再到长春，再到哈尔滨，然后到沈阳，再回北京。但在我们要出发时，华清舅舅坚持要华清在家多住几天。华清舅舅说，多少年才见一次面，哪能才住了几天就走？一定要华清多住几天。华清不好意思薄了舅舅的面子，答应在家多住一段时间。

##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我和小梅两个踏上了旅行的征程。我们看到山东风光秀丽，决定徒步旅行，前往威海，从威海再到烟台，然后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从荣成到威海，再到烟台，我们一路走的基本上都是山间小路，当时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我们阅尽了胶东半岛的秀美景色，也尝遍了胶东半岛美味的苹果和梨，西瓜和甜瓜。喜欢搞地质的人，大都喜欢徒步旅行，融入大自然之中，感到遍体通透，心旷神怡。路上的小旅馆很便宜，一两块钱就住一个晚上。小餐馆的菜也便宜，一个柿子椒炒肉丝才一毛五分钱。

我们游了威海，那时威海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停了一天多就离开了。又前往烟台。第二天晚上，我们坐上了轮船，一觉还没有睡醒，一大早就到了大连。我和小梅下了船，坐电车去找小梅哥哥的同学郑曼凯医生，他在大连的一个大医院工作。我们在离开北京前，小梅已经打过电话联系好了。我们是坐电车过

去的。我十分欣赏大连的公共交通，大连的有轨电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车次很多，也比较准时，间隔时间很短，往往前一辆刚刚过去，还没有从视野中消失，下一辆车已经露头进入了你的眼帘。而且车票便宜，两分钱一张，一次可以买很多张，不分车次日期，随便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们在大连住了几天。

这期间，大连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我和小梅跑到街上去看，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不知道参加武斗的是哪两个派别，只看到有一个派别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大街上飞驰而过。卡车驾驶室两个门的车窗的玻璃都摇了下去，两边车门的踏板上各站着一个手拿长矛的工人，戴着手套，戴着藤头盔，腰上扎着皮带。他们一只手拿着长矛，另一只手从摇下玻璃的车窗口伸到车里面把住车门来固定自己的身体。他们拿的长矛是用做铁栅栏的长铁棍一头磨尖了做成的。几十辆车，统一的配制，人员也是统一的打扮。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到哪里去。

等我们从大街上回到医院，看到医院里已经熙熙攘攘，送来了一些伤员，还有一位男性死者。人们都在忙着抢救伤者，那个死者被放在医院走廊上一张带靠背的长条凳上，无人过问。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死人，我大着胆子走近长条凳去看那个死者。那是一个年轻人，年轻到我估计只有十七八岁，肯定还不到二十岁。他仰面躺在长条凳子上，身上看不到血迹，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况，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的面部看起来似乎很安详。我在小说中经常看到对死人的描写，总是说，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现在我看到真正的死人了，我觉得小说里描写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他的脸色是蜡黄的，根本就谈不上苍白。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冰凉的，我很想去触摸他一下，以便验证一下是不是冰凉的，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着胆子用手背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就像触电一样不由自主地迅速地把手又缩了回来。我嘘了一口气，我的大胆尝试没有白费，小说的描写还是不准确的，死者的体温并不是冰凉的，我觉得是和他周围的物体的温度一样的，就和他躺着的那张长凳的温度是一样的。

##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我们在大连待了几天的，就坐火车去了长春。下了车，我们就直接去找长春地质学院，准备住在学校里。到了地质学院门口，往里面一看，竟看不到一个人影。学校内的主要路口，都有用装满沙土的大麻袋堆成的掩体。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学大楼，每一层的窗户的窗框几乎都没有了，窗户台上也堆着沙袋，变成了对外射击的工事，整个是一副大战后的衰败景象。我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学校大

院内没看到一个人经过或出现。我说，这算什么地方啊，整个是个荒凉的废墟啊，长春的武斗这么厉害啊！这地方我们不能住，长春我们也不能待，早点儿离开吧。我们随即又赶回了车站，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小梅有几个同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有两个同学在这个学校上学。我们到了哈尔滨，就直奔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小梅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两个同学。当时因为不上课，很多学生并不在学校，去串联的，回家的，都有。宿舍里没有几个人住，所以我们的住处很好安排。学校的设施很好，还有室内游泳池。我们去室内游泳池游泳，小梅很有两下子，他站在 10 米高的跳台上跳水，那么高，我可不敢跳，可小梅一个展翅高飞的动作，就从 10 米高的跳台很优雅地栽到了水里。我正在游泳池的边上，边游泳，边看着他跳水，两只手腾不出来，要不然我就举双手为他鼓掌。小梅又上去跳，我也被激励了，也上去跳。不过我不敢跳 10 米跳台，我上了 3 米跳台。模仿着小梅的动作，姿势肯定不好看，头朝下就栽进了水里。等我从水里浮出来，才发现我的游泳帽掉到水底了。我仰着脸对小梅喊，我的游泳帽掉水里了。小梅在上面说，知道了。然后就从 10 米跳台跳了下来，当 he 从水底浮上来时，手里拿着我的游泳帽，已经捡上来了。

我的两个同学，当时只有李军在学校，另一个同学史里武没见到。第二天，我和小梅去太阳岛玩。我看到松花江的水也是浑浊的，黄黄的。我以前总觉得松花江的水应该是碧绿的清澈的，没想到竟也这么浑浊。我们在太阳岛上转悠，看到有个老农在卖甜瓜，甜瓜的个头很小，是比苹果的个头还要小的瓜蛋蛋。我很纳闷，是这里太靠北了，生长期短，瓜长不大呢，还是恰巧叫我们碰到的这个卖瓜人只有小甜瓜呢？这个问题不去管它了，我们继续在太阳岛上转悠。转了一会儿，忽然有几个当兵的出现，他们嘴里吹着哨子，手里挥舞着小红旗，叫所有在岛上的人离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了岛。我们并没有离开，还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一个类似潜艇一样密封的土黄色的庞大的东西从水里钻了出来，以很快的速度冲上了岸，在岸上又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接着又钻进了江水里。我看到那个东西并没有装有轮子，不知道它是怎么在陆地上滑行的。前后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人们又可以上岛了，我和小梅很好奇，又跑到岛上去看，看到太阳岛的沙地上只留下一些轻微的擦痕，别的什么也没有，而且当时在滑行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有发动机的响声。真是奇怪，是什么新式武器吗？一点都猜不透。我们回到哈军工，告诉了同学们这件奇事，他们也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天，哈军工的同学们对我们说，今天外面要武斗了，大家今天都别出去了。我们都待在学校里，不出门。快到中午的时分，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

串枪声，像是机枪或冲锋枪的枪声，嘟嘟嘟嘟的一串儿。只听到这一串儿枪声，其后没再听到别的枪声。傍晚，有同学从外面回来，给我们讲述了外面发生的事。说是有一派开着卡车拉着人去武斗的时候，坦克制造厂所属的另一派，派出了坦克开上街去迎战。对方看到坦克出来了，吓得马上把卡车掉转头就跑了，坦克开快了去追。跑在最后面的一辆卡车，看到坦克跑得这么快，吓得把卡车一停，人从车上跳下来就跑光了，坦克一下子冲了上去，撞到了卡车上，坦克的前半部差点爬到卡车上，坦克车身斜了一下，可能那时机枪手的手正扣在扳机上，身子一歪，不由自主地扣动了扳机，就打出了一串子弹。坦克看起来挺笨重的，能跑这么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本来还想在哈尔滨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小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梅妈妈说，学校的李贵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问小梅去哪里了，要她一定要转告小梅，现在学校复课闹革命了，别在外面瞎转悠了，快回来上课吧。我和小梅早就想上课了，整天在学校游手好闲有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开始上课。这两年什么课都没上，我们急迫需要充实一下文化知识。我和小梅很快就乘车回到了北京。

---

## 【编读往来】

### 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昨天》95期张运钧、李颖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以下简称“兴衰沉浮”）很有看头，我感受最深的有几点：

#### 1. 朱成昭思想转变的轨迹

作为著名造反派“地院东方红”的灵魂，朱成昭批工作组、发起成立“三司”、“四进地质部”逼迫工作组组长回校检查赔礼道歉，还是蒯大富曾经的保护者、引路人。用当年话语，是位“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头子，中央文革最为倚重的“铁拳头”。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仅仅半年之后，朱成昭便由一个中央文革的“打手”，变成一个反叛者。他同情彭德怀，质疑中央文革，即使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批评、威胁，不仅“不思悔改”，还巧妙地以公开“检查”为名，把自己的质疑扩散（当年用语“放毒”）。最终为其带来了十余年的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是一个具备独立思考、有良知的人识破文革罪恶本质的过程，是一代人觉醒的缩影。

#### 2. “神秘人物”的秘密活动

“兴衰沉浮”披露：1966年8月初，北地校园内就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她自称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肖力，持有陈伯达签名委派她“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的“手谕”。她经常出现在“东方红”总部，频繁与朱成昭等人接触。

“东方红”首次进地质部当天，她即以“观察员”身份表示支持：“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

地院8月24日的“大辩论”，她亲临现场观察……

到了“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她不仅亲赴现场了解情况，还出谋划策，提出建议……她已经不仅限于一个“观察员”，实际成为了“东方红”背后的“参谋”和“靠山”。

直到1966年9月15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肖力，方知她原来是毛和江的女儿李讷！当晚，朱成昭兴奋地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通天”了！（以上见《昨天》95期P.16-18）

从肖力在地院的秘密活动中，我们可以大体窥破文革的谋略：那些拿不到、或一时不方便拿到桌面上的东西，是如何通过暗地里的秘密活动，指使或授意造反派来实现的。

### 3.背着“反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连俘”三员“大将”

“揪回”彭德怀的整个过程之所以有看头，并不完全在毛的意愿是如何通过江青与中央文革授意、鼓动和指令造反派去实施——这是文革中毛、江及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惯例。“揪彭”中最有看头的，还是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都先后成了彭德怀的精神“俘虏”。

第一个“落马”的是王大来，接到“揪彭”任务后，不仅迅速找到了彭的住处，还“见到了彭德怀本人，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将与彭的谈话做了多达50多页的记录。

紧接着，王大宾出场——他后来取代朱成昭成为“东方红”的一把手。听取王大来的汇报并阅读了王大来所提供的50多页的谈话记录后，王大宾又与彭德怀谈了一个下午。他同样被彭所感动……

更为神奇的是一把手朱成昭。平心而论，中央文革能把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东方红”，是何等的信任！又是怎样的荣耀啊！前一刻钟还在发火臭骂二王“耽误了战机”，但耐心地听完了专程从四川赶回来的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这位当时最受中央文革器重的造反派领袖——居然也转向了！成为了彭德怀的第三个“俘虏”。（以上见《昨天》95期P.28-29）

“庐山会议”的前因是“大跃进”，后果是“大饥荒”。而这一切又构成了毛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因。朱成昭触摸到了这个脉络，他转变了。这是中央文革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

后来，地院“东方红”还是按照毛和中央文革交办的任务，把彭德怀押解回了北京。然而彭在地院却影响深远。在当年“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氛围下，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喧嚣声中，背着“反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能从精神上先后“征服”了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却不能不说是文革中一个奇迹！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肖力”暗地里的秘密活动；彭德怀“连俘”三员“大将”……都折射出：凡是非正义的东西，总要千方百计编造谎言、掩盖真相。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靠暗地里的秘密活动，靠玩弄阴谋诡计，总是难以永久欺瞒下去的。

哲人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个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兴衰沉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7.11.15